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 「史學導論」題庫—web-data

[his.hcu.edu.tw/ezcatfiles/.../IntroductiontotheStudyofHistory-9611.doc](http://his.hcu.edu.tw/ezcatfiles/.../IntroductiontotheStudyofHistory-9611.doc)

### 「史學導論」題庫

1. 中國史研究，過去常常被拿來與歐洲史、西洋史做比較，請舉例說明過去學者對於「歷史比較」方法有哪些不同的看法，中、西史學的優、缺點為何？
2. 歷史研究中，有專史（如藝術史、科學史），也有所謂通史，試說明專史與通史的關係。並請舉例說明，在專史的「專門」背景下，何謂通史及其意義與價值為何？
3. 吾人從事史學研究，必須廣泛利用各種輔助科學的知識，方能有所進步。試就「考古學」以及「經濟學」兩者，分別列舉若干實例藉以佐證並詮釋其要義。
4. 史料必須經過適當的解釋，才能顯示其歷史的意義與價值，而當吾人從事歷史解釋時，究竟應該注意哪些原則？試論述之。
5. 所謂「孤證不立」或「孤證不足以定說」，吾人究竟應該基於如何的原則，才能較為正確地估量史料所載史事的可信性？試申論之。
6. 吾人從事歷史的綜合，既應注意史事發展之縱的因果關係，也要注意其橫的相互關聯。試分別舉例說明之。
7. 史學研究以史料為主要的基礎，請問史料就其價值而言，可以分為幾類？並請舉出實例說明之；而且史料需經批判才能進一步使用，請討論史料批判的方法，並以實例說明。
8. 原始史料與轉手史料於史料價值的判斷而言差異何在？
9. 歷史需要解釋，但史家對於歷史所做的解釋又常遭受質疑，其原因為何？
10. 環境生態的歷史書寫近來頗受重視，試問：環境史興起之原因為何？又台灣在環境史研究課題上，所能發展之方向與運用之材料各為何，試論述之。
11. 請舉出您最近所閱讀的任何一本史學名著，並討論其方法上的優、缺點。
12. 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是什麼？歷史研究是否屬於社會科學的範疇？歷史研究中應採用 *interpretation* 或 *explanation*？試析之。
13. 歷史學研究有重視科際整合的情形，設若以「台灣族群關係發展史」為題材進行研究，則有那些史學方法與相關學科可以相互配合運用已進行研究？
14. 史學應屬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或兩者兼而有之？試舉實例論證之。
15. 歷史學研究應力求客觀避免價值判斷，試就所知論歷史研究如何達到客觀中立的境界。
16. 何謂「社會史」？試分析其研究之趨勢及有關之資料。
17. 以蘭克史學為主的傳統史學於二十世紀初期，不論在史學本體論、認識論或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是方法論上，都出現嚴重的危機。法國年鑑學派史家如何就前述史學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三方面提出其觀點以應對此危機？

18. 西元 1500 年以後，歐洲不論在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皆有重大變遷，其史學思想亦因之產生鉅變。請說明 16 世紀、18 世紀及 19 世紀歐洲史學思想的演變。
19. 當代史學鼓勵運用社會科學方法及科際整合研究，請問傳統的史學，究竟應該如何和社會科學方法及科際整合研究進行對話？
20. 歷史研究能否避免價值判斷？有價值判斷在內的歷史著作是否牽涉到主、客觀問題？如果不做價值判斷，依你之見是否盡了史家的責任？
21. 何謂「歷史解釋」？並說明影響歷史解釋的各種因素。
22. 中國「史」字的意義指涉，大要而言，經歷了三個階段。由最初之指涉「人」（史官）而至指涉「書」（史書，史籍，史冊），近代以來，復又轉至指涉「事」（史事，歷史，史事）。試析論其「史」義指涉轉折之意涵與背景。
23. 坊間近有一本英國史家凱斯·詹京斯的《歷史的再思考》，論者咸曰此書是後現代史學的著作，其觀點在「歷史真相」上正好與西洋近代傳統史學有著針鋒相對的持論。試述你（妳）的看法。
24. 歷史知識可能客觀嗎？可的話，史家自主性何在？不可的話，歷史如何能成信史？請說明你的看法。
25. 民國初年以來思潮普遍充滿泛科學主義，史學界遂有：「史學便是史科學」的說法盛行；您同意這樣的看法嗎？何謂史料？它和史著的關係為何？請試述之。
26. 史學家和文學家都要講究文字的運用，那麼史家之文和文學有什麼樣的不同？
27. 新史料的發現往往能夠填補歷史的空白，或修正過去的錯誤。請任舉一、二實例說明。
28. 何謂歷史想像，並說明其在史學研究上的重要性及局限。
29. 試說明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互補性。
30. 自從社會科學發方法逐漸被引入歷史研究後，傳統史學家由抗拒到批判性地接受，直至二十世紀後半期，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已呈交流並進的趨勢。請問在這段期間，傳統史學曾遭遇那些強烈的挑戰？歷史學又發展出那些新的研究領域？
31. 請分析說明十八世紀以來西方史學界何以興起「科學治史」的主張？此派理論的內容重點為何？以一位今日有志於從事史學研究的學習者而言，你（妳）認為應該採用何種態度去對應此種主張？
32. 請舉實例以說明何謂「歷史敘述」？何謂「歷史解釋」？兩者的關係為何，在歷史研究中各有何重要性？如何圓滿的將兩者充分運用到歷史研究中。
33. 關於史料，近代十分重視，並頗強調其價值、意義，大約近六十年來，頗流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行一概括性命義，即「史料便是史料學」，此說首見於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第三頁；蔡元培亦有「史料本是史料學」之說，見於《明清史料》〈序言〉。請問：你對他們的說法有何意見？

34. 二十世紀史學家輩出，請舉出一、二位重要歐美史學家，並說明其對今日史學研究的重要貢獻。
35. 歷史學家在建立史實之間的因果關係並提出歷史解釋時，可能遭遇那些問題？應如何解決？試以你自己的實際研究經驗為例加以分析。
36. 有些史學家說「歷史」(History)與「虛構」(Fiction)沒有甚麼不同；又說「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都是「發明」(invented)出來的，其原因何在？你同意此說嗎？請以史學研究的過程（如史料之搜集、判斷、歷史解釋、綜合並表述等）為例，加以討論。
37. 近代中外史學在治史方法上最大的不同，是懂得利用其他學科以從事歷史研究。此外，以相關學問作基礎以解釋歷史上複雜而變幻莫測的多種現象，亦為眾家所樂用。此即所謂之歷史輔助科學，其種類繁多，相輔相成之程度亦各有所差異，請略加論述，並舉你熟悉的輔助科學為例說明之。
38. 請列舉一本你所讀過的中外史家論「歷史本質」的專書（古今皆可，專論、通論不拘），介紹其作者、內容重點並評論之。
39. 試就所知論述近代西洋史學理論和方法的發展趨勢，特別是二次大戰之後，歐美史學界在研究理論和方法有何重大的突破？
40. 試說明傳統史學與新史學在研究領域及研究方法上之異同。
41. 試評述後現代主義史學。
42. 傳統史學與新史學之間的差異性為何？請論述之。
43. 何謂史料考證？請你用約 300 個字簡要說明。
44. 從一位作者的引書格式，可以看出他書寫一篇文章是否注意細節，以及他博覽群書的功力。以下，試舉一本中文專書或一篇文章，以及一本英文專書或一篇文章，在 WORD 的當頁注中，你如何引用專書或論文？中英文分述之。
45. 試述法國年鑑學派的理論特色與代表人物。
46. 何謂史料的外部考證與內部考證，試論述之？
47. 試論述何謂歷史的比較研究法與「比較史學」？
48. 清末民初時期，中國經歷數千年未經之巨變，西方的各項學說大量湧入對於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造成莫大的衝擊，進而有學者對於傳統史學進行強烈的批判，並且力倡促成了近代中國的「史學革命」。試舉當時的知識份子一人為例，並闡述其思想內容？
49. 請解釋何謂「直接史料」、「間接史料」、「有意史料」、「無意史料」？其價值為何？
50. 試述史學著作中紀傳體與編年體兩種體例各有何優缺點？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

說明：

一、本題庫所附解答，僅供參考。因為申論題不是「一言堂」，

很難有「統一的」、「唯一的」或「標準的」解答。讀者不妨

舉一反三，各就所知，自由發揮。

二、本題庫暫列條目若干，日後隨時擴充。

1.中國史研究，過去常常被拿來與歐洲史、西洋史做比較，請舉例說明過去學者對於「歷史比較」方法有哪些不同的看法，中、西史學的優、缺點為何？

中西史學各自獨立發展兩千餘年，直至十九世紀末葉史漸通聲息，而兩者以文化背景之不同，歧異極大，因而從中便產生了許多對彼此的誤解。<sup>1</sup>便有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產生許多誤解，認為中國傳統史學為「儒家史學」，是為政治服務缺乏求真客觀的精神。而中西史家對於各自在這隔閡以久的狀態下，各自演變出以自我文化為中心的「中心論」。但事實上，西方史家批評中國史學的諸多缺點是用現代西方的史學概念來審之，但中國史學的人文精神卻遠早於西方是不爭的事實，翻譯司馬遷《史記》的華真（Burton Watson）便說：「中國的歷史意識源自於周代的人文精神」<sup>2</sup>因此，在比較中西史學的同時，須審慎的注意。

中國的史學優點在於對歷史研究的探討比起西方更早誕生人文精神，其傳統史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淑世乃至於救世，因此時代變亂愈大、憂患愈多，史學往往愈發達，例如明清之際，在顧炎武所謂「天崩地解」的時代動盪裏，史學格外興盛；相反地，史學精神的衰落通常也就是時代精神衰落的指標。史家自視為歷史真理的守護者，並特重道德判斷中國歷代史官，在原則上都能保持直書的傳

---

<sup>1</sup> 參見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頁352。

<sup>2</sup> 轉引自汪榮祖，《史學九章》，（台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頁137-138。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統，秉筆維護他們心目中的道德與正義。例如《左傳》記載襄公二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終使崔杼不得不放棄竄史的念頭。由於中國史家以經世為目的，自視為真理的守護者，因而發展了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合而為一的著史傳統，特重褒貶。此外中國傳統史學的考據功夫極為看重，認為乾嘉時期的樸學以及古代史料的考偽傳統也為中國史學的一項特色。

但近來清末民初西方的思維傳入中國，對於中國史學思想造成巨大的衝擊，如梁啟超等學者便藉由西方史學指出中國史學的缺點在於太過側重政治史，只關注於上層的歷史發展，卻忽略了非政治史與下層歷史的脈絡，而西方史學在啟蒙運動至二十世紀時的史學研究便補足了中國史學之不足之處，值得借鑑。

因此對於中西史學的比較，是在相當長時間裡各自獨立發展，但這並不表明中西史學缺乏比較的基礎。不論是從宏觀的視野比較中西史學的傳統，還是從微觀的角度審察中西史家的異同，都有助於加深我們對中西史學的理解和認識。中西史學發生的文化背景不同、地理環境殊異，分歧較為明顯。但是，史學研究並無高低優劣之分，因為中西史家對於歷史研究的定義發展至今終究目的相同，便是擁有共同的史學理念「求真」價值觀。

2.歷史研究中，有專史（如藝術史、科學史），也有所謂通史，試說明專史與通史的關係。並請舉例說明，在專史的「專門」背景下，何謂通史及其意義與價值為何？

通史是指記述由遠古到作者所處時代的史書，以時間為主線，連貫地敘述各個時代的一種記史方式。通史可視為一種跨越時代的歷史研究，不間斷地記敘長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時段的歷史事件，司馬遷的《史記》為代表作之一。用現代史學的觀點來看，通史就是所謂「宏觀史論」。<sup>3</sup>而專史係指專門深入某個領域的探討，討論的範圍不像通史廣大，概括的時間也不如通史的淵遠流長。專史是以單項領域的深入研究來論述歷史的演變，也可說是以小看大的「微觀史論」。

研究歷史，不應該偏重於通史或是專史。例如當我們研究政治史時，勢必以政治人物與政治制度等問題著眼下手，但是歷史學可不只有政治而已。專史的研究雖能使歷史研究詳細確實，不過往往會因為過於詳細而流於瑣碎，或注重某個領域而忽略掉了其他部分。相形之下，通史的意義與價值就在這裡顯現出來。要完善的重現歷史的真實，就不應偏重任何一方。更進一步說，通史與專史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專史（微觀）是詳細且可能運用其他學科或領域的方法來解釋歷史，通史（宏觀）則猶如將一個個詳細的專史連結在一起的一條線。通史與專史之間的關係，就像是宏觀與微觀是「小大由之」、交相為用的關係一樣。<sup>4</sup>

3.吾人從事史學研究，必須廣泛利用各種輔助科學的知識，方能有所進步。試就「考古學」以及「經濟學」兩者，分別列舉若干實例藉以佐證並詮釋其要義。

現今的歷史研究不能只注重於傳統的文獻解讀，需借助其他學科的方法才能有所進步，而「考古學」與「經濟學」變是其中兩種。

首先必須先區別考古學與歷史學的相異之處，考古學研究的對象為實物。主要是物質的遺存，或者說是遺物與遺跡。而這些遺存應該是古代人類的活動遺留下來的。且是以借助科學的工具來重建歷史真相。不過考古學與歷史學在學科性質上至少有兩點比較接近：第一、它們都是探索過去的學問；第二、它們的資料

<sup>3</sup> 參見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0%9A%E5%8F%B2&variant=zh-tw>。

<sup>4</sup> 參見劉子健，〈史學的方法、技術和危機〉，收入康樂、彭明輝主編，《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 122。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往往待有機遇性，不夠完備。<sup>5</sup>而歷史學是一門以史料的詮釋和運用為基礎的科學。史料有傳世的史料和湮沒的史料，有文字形態的史料和實物形態的史料，傳世的史料多為文字形態的，湮沒的史料多為實物形態的。而考古學對於歷史研究的最大意義，即在於將那些湮沒在地下的實物史料發掘出來，以彌補傳世的文獻資料的不足。二十世紀中國考古學的蓬勃發展，無疑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歷史研究單純依賴傳世文獻的尷尬和無奈。王國維先生率先提出「二重證據法」，主張以地下出土之文物資料與傳世的文獻記載相印證，並依據考古學的成果，在中國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重大突破。因此在歷史學以文獻資料考證之時，便可藉助考古學的科學方法與工具來驗證出土文物與文獻之間的比較，以便更能求得歷史真相的全貌。

舉例說明，像先前人們認為中國的文明起源乃是從黃河流域一帶發跡，再向外擴張的「單一中心論」，但隨著考古出土文物的發掘證明，遂將中華文明的起源修正為多元並行而非單一局限於黃河地區，這些歷史研究成果就須仰賴考古學的科學專業部分來輔助之。

另一方面進行歷史研究時，也可藉助於經濟學的理論，如眾所周知的馬克思的理論核心為歷史唯物論，主張下層結構影響、改變上層結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互為作用，使得人類的文明(生產樣式)隨著生產力水準的提升而不斷演進。在此理論架構下，現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係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及背景下，只是人類文明(生產樣式)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也因此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分析中，雖然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作了極為深入與周延的觀察與探討，但是亦不失作為歷史研究的經濟學之功能。以歷史唯物史觀的邏輯與理論架構所建立的分析模型來說，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前，人類歷經了原始共同體、亞細亞(納貢制)社會、古代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其後則推論將有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社會的到來。此外現在再經歷過全球金融海嘯之後，也有越來越多人將觀點著

<sup>5</sup> 參見杜正勝《新史學之路》(台北：三民書局，民國93年)，頁213。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重在世界經濟體以歷史的出發點來進行研究與探討，這些都是進行史學研究時，藉助經濟學的最好例子。

4.史料必須經過適當的解釋，才能顯示其歷史的意義與價值，而當吾人從事歷史解釋時，究竟應該注意哪些原則？試論述之。

史料的種類可分為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但就算是最可信的直接史料，也可能有不可信的地方存在。所以當我們使用任何史料來進行歷史解釋時，需要抱持著懷疑的精神，先對史料進行考證，才能再進一步做歷史解釋，這就是所謂「考而後信」。<sup>6</sup>

根據班漢穆的分類法，史料考證可分為外部考證與內部考證；杜維運在《史學方法論》一書中，曾作詳細介紹。進行外部考證應該注意的原則、方法，包括：史料是否為偽書的考證、史料產生時代的考證、史料產生地點的考證、史料著作人的考證以及史料原形的考證。首先，造偽書是中外歷史上極為普遍的一種現象，書越古，偽品越多，因此辨偽書就是在做歷史解釋時，要先加考證的重要原則之一。史料產生時代的考證工作也相當重要，每一種史料原來的出版年代如果不確定，那史家就難以對其內容做精密的評估。另外史料產生地點的考證，重要性雖不及產生的時代重要，但環境對人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所以設法考證史料的產生地點，也是外部考證工作之一。至於影響史料最大者，就是史料著作人的考證，這也牽涉到該史料的可信程度。最後對於史料原形的考證，校勘同一種史料的不同版本，也是史料外部考證的工作。<sup>7</sup>

使用內部考證時，需注意三方面。第一是記載人信用的確定。影響史料內容最大者，為史料記載人，史料內部考證的重點一之為研究史料記載人之為人，其

<sup>6</sup> 參見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頁168。

<sup>7</sup> 參見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頁171-182。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信用程度的確定，最為重要。第二是記載人能力的確定。史料記載人的能力，也應注意。文字能力如有不足，則難將曲折複雜之事清楚且正確的表達出來；知識素養不夠，則凡所撰述，皆難期精確無誤。第三也就是最後重要的部分，那就是記載真實程度的確定。<sup>8</sup>

因此當我們在做歷史解釋時，需注意解釋史料的內外部考證的原則，才能正確且真實的還原史料及其原有的價值與意義。

5.所謂「孤證不立」或「孤證不足以定說」，吾人究竟應該基於如何的原則，才能較為正確地估量史料所載史事的可信性？試申論之。

歷史考據學有一些基本原則，如第一手材料的原則，就是說，你要證明你的觀點，所用歷史材料必須是最早的第一手材料，不能輾轉引用別人觀點；又如孤證不立的原則，就是說，單一的歷史材料不能成立。孤證不立，指考訂史實時，應多方求證，不能僅憑孤立的證據，即草率下結論。

遵守孤證不立的原則要注意以下幾點：

- (1) 盡力通過史料自身存在的矛盾，考訂其真偽；利用其他文獻的旁證，只能作為參考。
- (2) 無論是通過內證還是外證，各結論之間不能互相矛盾。
- (3) 孤證不立是考訂史料實的一般原則，但是，也不排除有的史料只要抓住一個重要矛盾即可斷定其偽，也就是孤證即立的可能性。
- (4) 要經得起反證，即用錯誤結論逆向證明原內容不正確。謙退卻疑，指證據不確或證據不足時，不硬行考訂，寧可懸而不斷，也不要牽強附會，

<sup>8</sup> 參見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頁182-190。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允許存疑待證以避免結論牽強。<sup>9</sup>

梁任公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曾歸結乾嘉學風的十點特色<sup>10</sup>，曰：

- (1) 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摒。
- (2) 選擇證據，以古為尚。以漢唐證據難宋明，不以宋明證據難漢唐；據漢魏可以難唐，據漢可以難魏晉，據先秦西漢可以難東漢。以經證經，可以難一切傳記。
- (3) 孤證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則棄之。
- (4) 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
- (5) 最喜羅列事項之同類者，為比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則。
- (6) 凡採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認為大不德。
- (7) 所見不合，則相辯詰，雖弟子駁難本師，亦所不避，受之者從不以為忤。
- (8) 辯詰以本問題為範圍，詞旨務篤實溫厚。雖不肯枉自己意見，同時仍尊重別人意見。有盛氣凌轢，或支離牽涉，或影射譏笑者，認為不德。
- (9) 喜專治一業，為窄而深的研究。
- (10) 文體貴樸實簡潔，最忌言有枝葉。

中國史學傳統中有孤證不引的規範，可說是發掘歷史真相的一個過程。這裡的「引」，是指引用史料典籍中的話證明自己的觀點。所謂孤證不立，是因為偏難概全，孤證立論乃史家之大忌，此點尤為考據學派所強調。清代學者戴震在《與姚孝廉姬傳書》中批評以前的治學方法是依于傳聞，以擬其是；擇於眾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考據學派注重實證，堅持無證不立論，孤證不定論的治學原則。譬如乾嘉學派，其研究方法強調實事求是、無徵不信，且不以孤證自足，必取之甚博。梁啟超曾總結乾嘉學風凡立一義，必憑證據，孤證不為定說。其無反證者姑存之，得有續證則漸信之，遇有力之反證

<sup>9</sup> 參見 [http://www.zikao365.com/html/4\\_21\\_26/2007\\_2\\_6\\_wa60192231716270023938\\_0.htm](http://www.zikao365.com/html/4_21_26/2007_2_6_wa60192231716270023938_0.htm)。

<sup>10</sup>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版，第 47 頁。

則棄之。<sup>11</sup>

6.吾人從事歷史的綜合，既應注意史事發展之縱的因果關係，也要注意其橫的相互關聯。試分別舉例說明之。

在從事歷史研究的時，須從縱向的因果關係與橫向的平面關係來分析解釋。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做切入，所謂縱向發展，是指人類物質生產史上不同生產方式的演變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會形態的更迭，也就是所謂前後的因果關係。以馬克思主義為例，根據人類社會內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質，把人類歷史發展的諸階段區分為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和三民主義制五種生產方式和與之相應的五種社會形態。它們構成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發展的縱向序列。但是不同民族、國家或地區在歷史上的多樣性，和世界歷史的統一性並非互不相容的矛盾。總的說來，人類歷史由低級社會形態向高級社會形態的更迭發展，由原始的無階級社會到直接生產者遭受不同形式奴役和剝削的階級社會，又由階級社會到未來三民主義沒有奴役和剝削的無階級社會，儘管形式各異，先後不一，這個縱向發展的總的過程，卻仍然具有普遍的、規律性的意義。基於這一理解，馬克思主義史學在闡明人類歷史的縱向發展方面已經作出了不少可貴的成績。

所謂世界歷史的橫向發展，是指歷史由各地區間的相互閉塞到逐步開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聯繫密切，終於發展成為整體的世界歷史這一客觀過程而言的。在史前時代，處於原始狀態的人類以氏族部落或村落為單位，分散地生活在地球的各個點上。儘管考古學家以實物證明，這些分散的點並不是完全彼此孤立和隔絕的，曾經有過某些偶然性的接觸，但是，由於當時物質生產水平極端低下，各

---

<sup>11</sup> 參見黃黎星：《糾謬文章與乾嘉學風》，載《中華讀書報》2002年4月3日。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個點都還不可能有多大程度的分工，不可能有多大程度的彼此交換和交往，也不可能有多大範圍的開拓活動。因此，點與點之間基本上是相互閉塞的，其橫向聯繫幾乎沒有，即有也極其有限。在進入農耕和畜牧之後，隨著物質生產力的發展，私有財產的形成，一些地區先後出現階級社會。這就突破了原始氏族部落的極端狹小的孤立狀態，開始結成有一定領域範圍的國家。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也開始出現較多的交往，包括和平的和暴力的交往。但是，在階級社會的前資本主義諸階段，即使在經濟發展比較先進的農耕地區，基本上都還是自給自足的經濟。社會分工和交換雖有所發展，但畢竟有限，手工業和商業都還處於附屬的、補充的地位，只要生產沒有超出自然經濟的範圍，各民族、各國、各地區間相對閉塞的狀態就依然存在。到了 15、16 世紀，資本主義在西歐萌芽滋長。隨著「地理大發現」，西方國家的海外殖民擴張，以及世界市場的形成，過去長期存在的各國、各地區、各民族間的閉關自守狀態才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被打破，整個世界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也才逐步形成為密切聯繫的、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一體。

橫向發展一方面受縱向發展的制約，一方面又對縱向發展具有反作用。橫向發展與一定階段的縱向發展相適應，就往往能促進和深化縱向發展。希臘人的早期城市公社發展到一定水平，便開始向周圍地區移民，廣泛建立移民點。這些移民點和許多由之分出的城市公社之間，存在著各種聯繫，特別是擴大奴隸來源方面的聯繫，而這類聯繫又促進了希臘城市公社向更高水平的發展。公元 3 世紀及稍後，中國北部的鮮卑、拓跋諸族，歐洲的日耳曼諸族，當他們有了鐵器，知道農耕，開始進入階級社會，從而具有一定向外擴張條件的時候，或者和平遷徙，或者暴力侵犯，向與他們鄰近的先進農耕地區擴展，這在他們的歷史上，是適應縱向發展的橫向發展。這個橫向發展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打開民族之間的閉塞局面，而且加速了他們向先進的封建社會形態過渡。這就是說，橫向發展促進了歷史的縱向發展。在歷史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時代，橫向發展對縱向發展的反作用表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現得尤其明顯。這個時代西方國家的海上商業擴張和殖民活動，使世界各地區間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而這種世界性的密切交往，又轉過來促進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資本勢力對封建農業體系的瓦解以及後來資本主義大工業的出現。如果一個地區缺少與其他地區的橫向聯繫，其縱向發展必然遲滯。<sup>12</sup>

由上可見，歷史的縱向發展和橫向發展是歷史發展為世界歷史過程中的兩個基本面向。而在這兩種面向的互相交錯下，對於歷史的全貌與研究上能有著更為全面的認知與幫助。

7.史學研究以史料為主要的基礎，請問史料就其價值而言，可以分為幾類？並請舉出實例說明之；而且史料需經批判才能進一步使用，請討論史料批判的方法，並以實例說明。

十九世紀末，西方史學方法論鼻祖班漢穆，將所有的史料，分為傳說與遺跡兩類。今僅略具班氏之說，自口頭傳說、文字記載、實物三方面，以言史料的形形色色。<sup>13</sup>

口頭傳說：如掌故、口碑、逸聞、諺語、歌謠、神話傳說等。這些材料雖會因口耳相傳而逐漸失真，但其間仍保留若干史實的餘影。

文字記載：所謂文字記載，包括各種檔案、政書、詔令、奏議、年鑑、回憶錄、日記、傳單、廣告、小說、調查報告…等等。

運用文字記載時，應考慮它們史料價值的層次問題：從某層次來看可能是不足採信的無用資料，如果從另層次來看，卻往往可以化腐朽為神奇，成為論證特定命題時的有力佐證。例如《莊子·胠篋》篇虛構盜蹠譏諷孔子（551-479B.C.）之事，為一則偽造的傳說，雖然無法用來考訂孔子的行誼，卻可以用來分析戰國

<sup>12</sup> 參考自 [http://w9.loxa.com.tw/tj920452/mian\\_Folder/science\\_Folder/li-she.htm](http://w9.loxa.com.tw/tj920452/mian_Folder/science_Folder/li-she.htm)。

<sup>13</sup> 參見杜維運《史學方法論》頁 145-146。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476-221B.C.) 晚期反傳統思潮的激盪。

實物遺存：如甲骨文、金文、乃至金字塔、美國〈獨立宣言〉等。中國史學界對實物遺存之史料價值的重視，可上溯至宋代金石學的興起，《宣和博古錄》即記錄了相當豐富的實物遺存資料。但地下材料真正受到重視則始於五四時代，例如北大國學門、清華研究院、中研院史語所，以及晚近大陸考古學的澎湃發展。

史學工作者對史料進行檢查，考察其可信度，此之謂「史料的批判」。這項工作又可分為兩個層次：內部的批評及外部的批評。

史料的外部批評工作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

- (1) 該史料產生於何時？(When)
- (2) 該史料產生於何地？(Where)
- (3) 該史料為何人所撰寫？(Who)
- (4) 該史料為獨立亦或為轉引？(How)

以上四個外部批評的步驟，均與中國史學傳統中的「辨偽學」相近，在梁啟超（任公，1873-1929）《歷史研究法》第5章及杜維運所著《史學方法論》第10章，對於此問題即有相當詳細的論述。

就根本原則而言，史料產生的時代與歷史事實發生時日愈近者，其史料價值愈高；史料產生地點與歷史事實發生地點愈近者，其史料價值愈高；史料為獨立而非轉引者，其史料價值較高。我們可以說，司馬遷撰著《史記》所用的幾項方法，如考信六藝、多從古文、闕疑傳疑、訂正錯誤等，完全符合了外部批評的根本原則。

史料的內部批評：

此一層次的史料批評必須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 (1) 史料之撰述者信用如何？——是否為史實之原始目擊者？
- (2) 史料之撰述者能力如何？——對史實是否有判別能力？
- (3) 史料之可信度如何？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 a. 與其他史料是否衝突？
- b. 與客觀證據是否衝突？
- c. 與常情是否衝突？例如《史記·刺客列傳》乃參考《戰國策》而作，然而《戰國策》撰寫趙襄子被豫讓之怨忿精誠所殺害一段不合常理，故司馬遷將之刪除。
- d. 與實物印證是否相符？

任何史料皆必須經過外部批評與內部批評，才能成為正式研究的素材。

### 8.原始史料與轉手史料於史料價值的判斷而言差異何在？

「歷史研究的整套近代方法，奠基於原始史料與轉手史料的劃分此疆彼界。所謂原始史料，為目擊者的陳述文獻以及事實自身的遺存，數者皆與事件同時。所謂轉手史料，為史學家或編年家論述彼等所未及親見的事件，僅憑傳聞或直接或間接的參稽原始史料而來。稱頌原始史料，為其真實可靠，稱頌非當代的史學家——或轉手史料——，為其對資料的解釋與評價公正。」——蒙米里諾

西方近代史學家喜將所有史料分為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這與將史料分為原始史料與轉手史料沒有太大差別。直接史料最高境界，是當事人直接的觀察與直接的回憶，這也是班漢穆對直接史料所下的定義；其次是指一切與事件有直接關係的史料，無論遺物或記載；同時人對第三者的記載，是最低限度的一種直接史料；同時，直接史料必須是第一手的史料，或原手的史料，而不是第二手的史料，或轉手的史料，史料一經轉鈔或編纂，即成為轉手的或第二手的，就性質上講，即降為間接史料，而非直接史料了。

與直接史料相對的間接史料，易於理解。凡非直接的史料，非原形的史料，經過轉手的史料，都是間接史料。因此凡由口頭傳說而轉為記載的史料(同時人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的記載除外)，都是間接史料，凡由後人編纂的史書，都是間接史料，凡仿製品與改造品，也都是間接史料。間接史料的價值，在直接史料之下，不言而喻。<sup>14</sup>

### 9.歷史需要解釋，但史家對於歷史所做的解釋又常遭受質疑，其原因為何？

許多人懷疑歷史著作並不能忠實的敘述過去的實況，因此史家的價值判斷和歷史解釋，也只是反映他的個人觀點而已。歷史解釋真實性常受懷疑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 第一、 事件的實況，永遠比歷史更為豐富，史料既不能完全得到，也不能完全容納於歷史著作中。
- 第二、 歷史著作中所表現的架構及連續，並不與事實的架構與連續有真實的平行關係。
- 第三、 史學家寫歷史時必須用價值判斷，價值觀往往僅反映現在及未來可能有的意識形態，與過去並不相干<sup>15</sup>。
- 第四、 研究對象的選擇，特別是人類事務的研究，無疑是由一文化之性格所控制，並且有時為研究者的社會地位所影響。
- 第五、 研究並非在智識真空中進行，不論是誰，在從事研究時，其所有智識和指導觀念大多皆得自其所屬的文化。
- 第六、 研究所用的有效標準，無疑與一文化的其他特色有因果關聯，而社會地位，階級和民族偏見，以及世界觀也每每左右一個人所接受的結論<sup>16</sup>。
- 第七、 歷史並不是科學，它無法用實驗或精確的數據來解釋一切所發生的現象。

<sup>14</sup> 參見杜維運《史學方法論》，頁 155-159。

<sup>15</sup> 甲凱，〈史學通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 74，頁 143。

<sup>16</sup> 萬年青書廊選譯，〈歷史哲學與歷史解釋〉，台北，寰宇出版社，頁 19~21。



10.環境生態的歷史書寫近來頗受重視，試問：環境史興起之原因為何？又台灣在環境史研究課題上，所能發展之方向與運用之材料各為何，試論述之。

環境史為一跨領域的研究，基本條件除具備生態學外，另涉及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哲學、倫理學、經濟學與政治學。環境史於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在美國率先興起，著重探討自然在人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歷史上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

環境史之所以直到戰後才開始出現，是因為戰後興起的現代環保運動的推動。而就現代環保運動而言，又以美國環保運動最有聲勢。這是由於二戰結束以後，美國一躍而為資本主義世界中最強大、最富有的國家，其生活水平遠遠超出了其他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提升生活品質就成為公眾的追求，環境質量的好壞也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可是，自戰後以來，美國的環境污染事件卻層出不窮。高科技的濫用所導致了新污染的嚴重後果在美國表現得最為典型。另外，美國自然環境變化的激烈程度和破壞程度，也遠遠超出了歐洲。在白人到達以前，美洲土著印第安人還處於原始部落階段，他們對美洲大陸自然景觀的改變也非常有限，但在幾個世紀之內，這裏的景觀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西進運動促成了美國的崛起，但也造成了自然資源的嚴重浪費和破壞，這些都促成了資源保護與自然保護運動在美國的興起。可以這樣說，沒有現代環保運動，就不會有環境史。環境史是現代環保運動推動下產生的一個新的史學分支。

現今台灣在環境史研究課題上，所能發展之方向與運用之材料以台灣梅花鹿的消失研究為例，十七世紀上半葉，荷蘭人佔領台灣時，壟斷鹿皮貿易，大量將鹿皮運往日本，導致台灣鹿大量減少。鹿的繁殖力不強，每年僅一胎，年年大量捕捉使數目銳減。雖然荷蘭後來曾實行兩年狩獵、第三年休息的保護法，清朝也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曾禁止使用陷阱捕鹿，但都無法挽回台灣野生鹿群逐漸消失的困境。這是人類改變自然環境的一個負面例證。

台灣過去曾有許多環境史論述，但多非歷史學者。環境史需要借助其他學科研究成果，除了既有方志等歷史文獻中的史料等待學者挖掘利用，現代科技技術也能幫助學者掌握精確空間資料，如航照圖、衛星拍攝地面影像與地理資訊系統等，才能瞭解環境變遷相關問題。此外兼用統計學、經濟學等數據與歷史文獻中的內容相比較，方能對於台灣的环境史研究能有進一步的發展。

### 11.請舉出您最近所閱讀的任何一本史學名著，並討論其方法上的優、缺點。

以劉知幾的《史通》為例，其書著重於歷史學的方法，對舊史作全面總結，內篇論史家體例，辨別是非如他提出的「六家二體」之說，他對史家的編纂態度是實錄的直書，不掩惡，不虛美，且為中國第一部綜合性史學評論鉅著。

劉知幾在《史通》一書中總結了唐代以前史學發展。如在「六家」、「雜述」、「二體」等篇總結了歷史著作的類別、源流和體例；在史官建置、核才、辨職、忤時等篇總結了設官修史的教訓；在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斷限、編次、載言、載文、書事、煩省等篇總結了紀傳史與編年史的體例、內容及編纂方法等等。

他並且提倡疑古、惑經，啟後世考證辨偽之風，此於史學之貢獻極大。劉氏提出疑古、惑經之論，喚醒學人以實事求是之精神，尋求古人古事之真相。影響了後來史家的疑古精神，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而別為考異三十卷，闡明對史料取捨的原因，可見一斑。清代學者之考證辨偽，深具懷疑精神，致力於考訂工夫，且不僅於史事多所訂正，即一般古籍亦有所辨正。

在史料工作方面，劉氏主張要廣搜博採，又要細心鑒別真偽，慎重取捨。他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認為，若不徵求異說，採摭言，則內容貧乏，難以成一家之言，但若只求聚博為功，而不別加研核，又會真偽混淆，是非參錯。故史料不但要豐富，而且要真實。在史書的體例方面，劉氏深入分析史書的體例。他對六家二體之評價甚為詳盡。他以六家中尚書記言而不著歲序，春秋記事而詳顛末，國語國別而不歸典式，史記代遠而不立限斷，都不免有其局限；惟獨左傳經年緯月，敘時事則銓次分明；漢書紀志表傳，舉一朝則起訖完具。

劉知幾說明在文與史的關係方面，劉氏揭述經、文與史分述之觀念。且反對文人修史，主張史學脫離文學，以免「文非文，史非史」之弊。此與今日之史學觀點相合。他還提出所謂史家必須具備的條件。劉知幾認為歷史家要有科學的修養、公正的態度及實事求是的精神。書中暢論史家必須具備「三長」，即才、學、識三個條件，所寫的歷史才能反映社會的真實情況。史才，主要是指史家的才幹；史學主要是指史家的知識學問；至於史識，主要是指史家的史觀和筆法，也就是「善惡必書」的「直筆論」，劉氏強調「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

簡言之，《史通》一書最大的貢獻，就是對史學方法的討論。劉氏所提出的史學方法，甚有系統和全面，從史料的範圍、史料的採輯、史料的鑒別、史料的區分，到編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斷人物的評論、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飾等，都有創造性的研究和規劃，例如載言、編次、稱謂、採撰等篇，都是討論史學方法的。劉氏所提出的史學方法，對後世史家有很大的影響，把史學又向前推進一步。

《史通》的缺點部分，它對史書體裁的看法，僅僅局限於對過往的總結，未能提出新的設想；它說的史書編纂超不出編年、紀傳二種面向，亦不夠全面。它過分強調史書體例的整齊劃一，以致要求以生動的客觀歷史去適應體例的模式，因而對以往史書的批評亦往往失於偏頗。

12.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是什麼？歷史研究是否屬於社會科學的範疇？歷史研究中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應採用 interpretation 或 explanation ? 試析之。

所謂社會科學其目的都是要揭示對象的性質和規律、獲取關於對象的盡可能普遍的知識。可以說社會科學是採取科學的方法與思維來進行研究。科學是一種純粹的知識體系，一切科學都是一種「物學」；而屬人文學科的歷史學則是建立在一定知識基礎上的價值體系，一切人文學科都是一種「人學」。

當然人文學科也要研究物、研究各種事實性存在的性質和規律，但它決不滿足於、決不止於發現對象的性質和規律，而總是要進一步追問如此這般的對象、對象如此這般的性質和規律對人的生存和發展、對人的價值及其實現有何意義。

而歷史學究竟是否屬於社會科學的範疇，其實學生的看法為，歷史學注重探討的是縱向的因果關係，社會科學則是將重點放在橫向的平面關係。因此，歷史學並不是社會科學底下的分支，但歷史學必須得善加利用社會學科的科學方法，方可從縱向與橫向之間交錯中，更能多元全面地了解到歷史真相的全貌。

史家研究歷史，涉及史學態度與研究方法，往往不得利用解釋。但為免於引起誤解，又不得不對所謂解釋一詞之義界作一番說明，以確定其應用之性質。陸懋德主張其意義相同於英文之「interpretation」，如其所謂：「且死的史料，必經過如此的解釋，而後於現時人有用，於現時人有關。而後能變為活的歷史。此類工作，在西語謂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即謂『歷史的解釋』。」

余英時認為：「在兩派哲學中『解釋』雖同樣存在，但卻具有極大的差異，不可不辯。玄想派的『解釋』一詞我以為在英文中是 interpretation，而批評派則當是 Explanation。Explanation（亦可譯為『解說』或『說明』）的作用是將許多孤立的史實的真正關係尋找出來，使歷史事件成為可以理解的。這種解釋乃是歷史事實的一部份，決不容分割。離開了這種解釋，則歷史學便根本不能成立，而史籍也祇能流為一種流水帳了。「interpretation」則是人所加予歷史事實的一種主觀看法……這種解釋很難說有什麼客觀性，因之也是因人而異的。有些人往往不清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楚『解釋』有這兩種區別，以致以為史事之考訂及整理與『解釋』可以分為兩事。說這種話的人，其本意極可能是指「interpretation」而言，但顯然會引起嚴重的誤解。」

處理史料（歷史材料）以了解史實，須通過解釋始能達成。歷史若果沒有解釋就不成為歷史，而只是史料。西方史家 Harry Elmer Barnes（1889~1968）說：「收集事實，固屬史家之任務，然史家之工作，不能以蒐集事實，即視為該任務之最後完成。正如科學家不能以表列其觀察，即認為工作之終了。歷史材料之仔細解釋，實際上成為歷史中科學方法之最後完成，對於以前史家收集之繁眾事實，亦賦予相當之意義。」<sup>17</sup>

因此歷史研究中應就像如余英時先生所說的應採用「Explanation」來解明歷史的真相才是。

**13. 歷史學研究有重視科際整合的情形，設若以「台灣族群關係發展史」為題材進行研究，則有那些史學方法與相關學科可以相互配合運用已進行研究？**

自從十七世紀重商主義引進後，島與海結合，由封閉走向開放，因此能吸收多元的、進步的文明；同時利用台灣特殊的山與水的自然特質，不斷創造新經濟、新文化，終於蛻變為近代化國家。戰後，臺灣重新接受中國文化的洗禮，並吸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化，如今已呈現多元性文化面貌，至少包含四種成分，即原住民文化、西洋文化、漢人文化、日本文化，與中國原鄉社會有日益不同的特質。加上近來外籍新娘產生了所謂「新世代」的台灣居民，對於其複雜多元的文化又勢必注入新血，也因此衍生出不同的社會問題值得深入探討。

歷史學和其他社會學科與人文學科多有互相交涉之處，多年來科際整合的呼

<sup>17</sup> 參照自王文景，〈何謂「歷史」(History)？何謂「歷史學」？〉。資料來源：<http://anfang.homeip.net/viewthread.php?tid=444&extra=page%3D1>。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聲一直不斷，因此歷史研究需借重社會學、政治學及人類學等相關學科，方能才有更廣闊的學科視野。而台灣族群關係的發展歷史為研究主題，須先了解台灣其特殊且複雜的多元文化關係，才能了解族群之間的關係發展。而同時也不能僅侷限於在傳統歷史方法上的運用，而是需要更為多元的研究方法來解讀之。例如就政治學的觀點來看到族群問題，分析所為現今的「臺灣意識」中「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這兩個主要面向的複雜關係。在日益高漲的「臺灣意識」中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之間有其不可分割性，又有其緊張性。<sup>18</sup>另外藉助社會經濟學的角度做切入，可運用將台灣不同族群之間的分布情形、職業結構等面向，來深入討論族群關係的發展等等，這些皆是往後所進行的歷史研究中，蔚為主流的方向。

### 14. 史學應屬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或兩者兼而有之？試舉實例論證之。

歷史學究竟是屬於人文學科或是社會學科亦或者兩者兼之，學生的看法是，歷史學是屬於人文學科，而非社會科學。

現今的學術體制和學科分類，我們習慣於把所有的學科分為人文社會科學（文科）與自然科學（理工科）兩大類。這種分類其實是有問題的，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它把人文也視為科學，並稱之為「人文科學」；二是它認為所謂的「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是一類的東西，有時甚至把人文學科完全並入「社會科學」；三是它認為社會科學比較接近於所謂的「人文科學」而區別於「自然科學」。

其實人文並不屬於科學。今天我們所說的「人文科學」的英文對應詞叫做「humanities」，而「humanities」根本就不屬於科學（science）相反，從某種意義

<sup>18</sup> 參照黃俊傑個人網站：<http://huang.cc.ntu.edu.tw/pdf/CCA3707.pdf>。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

上說它還是與科學相對的東西。從西方古典時代以來，「humanities」主要包括哲學、史學、語言文學、藝術等等，《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將它翻譯為「人文學科」這是比較準確的。一切科學，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其目的都是要揭示對象的性質和規律、獲取關於對象的盡可能普遍的知識。與此不同，人文學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獲取關於對象的知識，而是要探尋人的生存及其意義、人的價值及其實現問題，並由此表達某種價值觀念和價值理想，從而為人的行為確立某種價值導向。可以說科學是一種純粹的知識體系，一切科學都是一種「物學」；而人文學科則是建立在一定知識基礎上的價值體系，一切人文學科都是一種「人學」。<sup>19</sup>

因此，史學是屬於人文學科，而非社會科學，歷史學就是以研究「人」為其核心的出發點的一門學問，但歷史學可以藉助於社會科學的多元方法，來更為清楚的詮釋歷史本身的問題。

**15.歷史學研究應力求客觀避免價值判斷，試就所知論歷史研究如何達到客觀中立的境界。**

基本上因為任何歷史事件都必須經由人的詮釋再表達出來，或多或少都有個人的主觀意見在。又因為在詮釋的過程中，會出現很多不同的歧異，所以要讓歷史事件完全客觀是不太可能的，但如果是只陳述一個歷史的現象，而不去做任何關於詮釋，或是表達歷史觀點的處理歷史就會彷彿就會變成沒有生命的空殼。因此，歷史現象所蘊含的意義與內容是必須經過詮釋來表達的。對於歷史事件，是主客觀都需要兼具的。客觀方面，我們必須忠實呈現史料。主觀方面，我們必須利用歷史學的想像來加以詮釋。若只有客觀的陳述一些發生過的歷史事件，而這

---

<sup>19</sup> 參照自此網站：<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9157/49165/9488963.html>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些歷史事件的背景、前因、後果與意義，皆沒有經過主觀的詮釋加以顯現的話，那麼這份史料將是毫無意義。若只有主觀的詮釋，則將無法看到你詮釋的根據，無根據的詮釋也是毫無意義的。因此總的來說，在進行歷史研究時，你無法整個去區分主觀與客觀，而你只能在呈現或詮釋時遵守一定的規範，而不至於過份的主觀或過份的客觀。

舉例說明過去的歷史學研究多只關心客觀世界的一面，以為這就是事實的全部。客觀的事實或者是表相的事實，就好像是「名牌」的原理一樣。名牌可以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但也有其主觀性的一面。名牌之所以為名牌，其作用只在於那些認識它且相信它是名牌的人身上。如果你不認識這個名牌，則這個名牌對你一點作用也沒有。即名牌之所以為名牌，這個法則只存在於認識這個名牌或名牌迷之間。所謂「客觀性」也經常是研究者將自己的主觀投射到歷史研究中。歷史學者追求歷史上的當事人如何主觀的認識、感受他所處的世界，並不意味著主觀的認識在倫理、道德上是對的。歷史學家或讀者當然可以用一套客觀的標準去批判歷史或當代，但歷史學的功用就是，通過「同情理解」，先設身處地設想歷史當事人的意志及其如何與所處的世界互動。

最後就主觀與客觀的課題而言，就甘懷真先生認為他仍相信歷史的許多層面、環結是可以被客觀認識的。要客觀認識歷史必須批判歷史當事人所做出的主觀認識，也不能誤將這些主觀認識認為是歷史的客觀。<sup>20</sup>

### 16.何謂「社會史」？試分析其研究之趨勢及有關之資料。

「社會史」是一門有別於傳統專門記載帝王將相歷史的學科，它開始注重一般市井小民的歷史。其研究的對象是「社會的歷史」。所謂「社會的歷史」，即有

<sup>20</sup> 參照自甘懷真，《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一個史學的觀點》，（臺北，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策畫，時報文化公司，2006年），頁109-123。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特定的時空範圍和社會關係範圍的「歷史」。這裡說的「社會」，不是一般與「自然」相對的「人類社會」那種廣義的概念，而是指一群享有共同地域和共同文化的、彼此之間發生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的人們組成的「共同體」。如政治制度、事件、人物、經濟、生產和人們的生活、家庭、宗教、人口、生育、營養、衣著、交通、教育、性別研究等議題，皆是「社會史」討論的範圍<sup>21</sup>。

社會史研究的特點：

- a. 量的觀察：為使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客觀性，並展現庶民文化等課題的普遍程度，因此特別重視隨機取樣等統計方法，講究從大量資料的比對中尋繹出社會演變的軌跡。
- b. 以社會群體為觀察對象：傳統史學較偏好對少數菁英分子的探討，現代史學則重視整體社會的價值觀或思考傾向。
- c. 重事實判斷：現代史學多不以道德判斷為重心，而以事實判斷為主要任務，史家並不直接顯示本身的價值理念於其研究之中。
- d. 夾敘夾議：分析性與敘述性融為一體。

相關著作舉隅：

- a. 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出版於1946年。當時許多史家盛行用馬、恩方法來研究中國社會史，從各章節內容看來，《中國古代社會史》參照了馬、恩所提出的社會演進定律，並企圖由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來肯定這些定律，使中國歷史成為印證馬、恩思想的東方版本。
- b. 李宗侗，《中國古代社會史》：以特定架構或理念貫串整部作品的社會史研究法，除見於前述侯氏撰著外，亦可見於李宗侗之《中國古代社會史》。李宗侗以希臘羅馬史經驗反觀中國古代歷史，因此特別重視原始宗教對中國古代社會的影響。
- c. Cho-yün Hsü（許倬雲），*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sup>21</sup> 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湖北教育出版社），34~35，頁74。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Mobility* , 722-222 B.C. (Stanford,1965)：許倬雲此書使中國現代社會史研究邁向了新階段。全書分為七章，這是中國史學界首次為「秦漢間乃天地一大變局」之思考賦予數據上的意義，完全反映了當時實證主義盛行、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強力滲透於史學的背景。

- d.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CP, 1985)：此書體現了八十年代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發展傾向，對長期性社會潮流與文化間的整合分疏有頗為深入的思考。
- e. 杜正勝，《編戶齊民》：此書基本上扣緊春秋中期至秦國滅亡四百年間平民的歷史，從兵役制度、賦稅制度、學校科舉等靜態史料來析探動態的社會變遷，對考古資料的運用也相當嫻熟，為中國社會史研究開創了新的業績<sup>22</sup>。

17.以蘭克史學為主的傳統史學於二十世紀初期，不論在史學本體論、認識論或是方法論上，都出現嚴重的危機。法國年鑑學派史家如何就前述史學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三方面提出其觀點以應對此危機？

首先需要了解蘭克史學的認知，蘭克認為，史學家的任務是據事直書，不偏不倚，如實客觀。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首先對史料進行批判檢驗，去偽存真，由此重現歷史，亦由此歷史學可以被擡入科學之列。蘭克的這種主張是在 19 世紀初自然科學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提出的，因為自然科學的極大成功使得社會科學家和人文科學家也希望通過觀察和實驗獲得對事物的不帶個人偏見的科學認識。將歷史學變成為一門嚴肅的實驗科學。

<sup>22</sup> 參見：<http://huang.cc.ntu.edu.tw>。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由於蘭克的這樣的主張，使得這一派歷史編纂偏重于政治史、軍事史、外交史等，因為大量第一手的、比較可靠的史料來自于政府文件、軍事、外交檔案及政治家的日記等。此外「據事直書」的原則導致了其歷史著述的特點是敘事、描述，而非分析、概括。蘭克學派的這些特點雖有極大的積極意義，但過於絕對地看待歷史的客觀性，否認史家對史料及史著的滲入，研究範圍較狹窄，方法較單一，故而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遭到哲學家和史學家的質疑。

現代西方史學的沿革，主要的就是由傳統史家典範轉向新史學典範，前者通常以蘭克的客觀主義史學派為代表，後者則是以年鑑學派為代表性的學派。年鑑學派自 1929 年誕生以來，迄今已歷近七十多年，從一個沒沒無聞的小學術團體，演變到成為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學派。新史學的誕生，年鑑學派實扮演著關鍵的主導地位。其所造成的影響更是跨越國界與科際，激起世界史壇及相關學域的廣泛回應。

首先，我們先對「新史學」這一名詞加以解釋。「新史學」在 1930 年就由它的創始人之一的貝爾（H.Berr）提出，根據 Peter Burke 的說法，他認為「新史學」指的是以法國年鑑學派為主體的「整體性的歷史」（total history）或「結構性的歷史」（structural history），也代表著對傳統史學的反思。而年鑑學派所提出的新史學是著重人類所有面向的活動，並以民眾的立場由下往上觀察，認為各種材料都可加以利用如口述、統計等方式。並且不同於蘭克史學是注重在歷史史料的絕對客觀的敘述上，其對於歷史的解釋注重於「結構的分析」上。<sup>23</sup>因此，年鑑學派的學說修正了蘭克史學在歷史本體、認識與方法論上的說法。整體來說，新史學的特色是革新史學，並且將它紮根在傳統史學中。這樣的革新被稱為「新史學運動」，在西方各國陸續展開，呈現出豐富多采的內容、方法，也獲得可觀的成就。

<sup>23</sup> 參考自：[http://his40.lacc.fju.edu.tw/gemmore/Cold\\_Cold&F00022L0&10](http://his40.lacc.fju.edu.tw/gemmore/Cold_Cold&F00022L0&10)。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18.西元 1500 年以後，歐洲不論在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皆有重大變遷，其史學思想亦因之產生鉅變。請說明 16 世紀、18 世紀及 19 世紀歐洲史學思想的演變。

歐洲史學的思想演變與其政治社會的變遷有著緊密的關聯，在文藝復興時代（泛指十四至十七世紀初葉），為中古與近代的過渡期，具體現象為古典學術的研究、人文主義的發揚、方言文學的興起、藝術的創新、加上新學說的提出。人文主義是文藝復興時期最突出的文化運動，人文主義者研究古典文化的經籍，以及以希臘和羅馬文學、文法、史學和倫理學等學問為主所構成的「人文研究」其目的在於解脫基督教神學的藩籬，重新發掘古典文化在政治、社會和宗教上的價值。而人文主義的發揚，繼而使方言文學的興起並讓各國文字的創作開始大量產生。因此，這一階段的歐洲史學的重大突破便是，創作開始多元豐富，並且不在是神學底下的附庸學科。

到了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誕生與科學革命的成功，使得此一時期的歐洲史學開始趨向提倡使用科學方法來進行研究。首先於開始對歷史進行考證。在這個時期，人們開始對中世紀時的以神學、哲學和演繹邏輯來解釋歷史的方法產生質疑，並對歷史文獻所記載的事物產生疑問，而對其進行考古研究與文物發掘。這個時代新的思想的湧現，使得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脫離了宗教思想的影響，從而產生其正獨立於宗教以外的學術研究。而因為歷史與哲學的創立、文化史研究「範式」以及對浪漫主義史學的開啟。在十八世紀後期，史學受到浪漫主義的影響，像是赫得等人提出「歷史有機論」，強調不能以現代標準貶抑過去；康德則認為史家任務為尋找大自然控制萬物進步的永恆法則，而歷史不能以科學方法加以了解，應靠直覺與靈性來感受。

到了十九世紀，實證主義史學思維具有兩大特徵：第一，在對歷史發展的看法上，他們遵循直線發展的模式，將地球上的各種文明、民族，依據他們心目中的標準，分出進步與落後、文明與野蠻。他們用一連串理性所設想出來的標準來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判斷歷史。因此過去所發生的一切，只是思想家進行邏輯推演、邏輯解釋的對象或材料。第二，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在近代自然科學蓬勃發展的影響下，也力求運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來處理歷史，實證主義哲學正在此時對歷史學產生強有力的影響。而到了蘭克學派後，他們認為史家任務是嚴格呈現歷史真相，應建立起一套嚴謹的方法，然後以客觀、公正的標準撰寫真實的歷史，效法科學的研究方法來進行歷史研究。而這樣的史學研究的學說產生，又是與當時工業革命的歷史背景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存在。

### 19.當代史學鼓勵運用社會科學方法及科際整合研究，請問傳統的史學，究竟應該如何和社會科學方法及科際整合研究進行對話？

傳統史學與社會科學理論方法的掌握問題，是現代史學所一直不斷探究的問題。社會科學的應用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是將其視作史學的輔助科學，幫助史學家考訂史料為目的。廣義則汎稱所有社會科學方法，其中最常被提到的是社會科學的量化方法的使用，嚐試利用量化手段進行歷行研究的情形十分普遍。針對這種量化除了成就上的肯定之外，但必須要注意的就是，史學不能完全的依賴社會科學的方法。如杜維運先生便指出：「史學家可以儘量應用量化方法，卻不能『迷信』方法，歷史有其『神秘之處』，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無法幫助史家獲取歷史之神韻。」

余英時認為社會科學的「厚今薄古」傾向，以史學觀點看來能說社會科學是「沒有時間性的」，社會科學不重視「傳統」也是其本身學科之「傾向」，史學觀點之重要性與其對比應將顯露出來，因為史學特別注重時間性，可補其觀點之不足。「史無定法」的論點更說明，有無數的好方法與理論值得史學家去吸收，但這些都只能起輔助之作用，不能將其視作為史學本身的方法。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然而，如同余英時先生對社會科學觀點有其「無時間性」之傾向，都是以史學重視「時間」觀點作為學科屬性之「標尺」進行度量。其他社會科學處理時間因素時也必需恪遵自身學科屬性之規範，才能避免「綜合」學科面對撕裂的危機。這種對跨學科研究的危機意識，不僅為史學領域專有，面對跨學科問題必定回歸學科性質、方法、目的等本質性問題，黃進興先生對社會科學方法使用的批評轉用於此，十分具有啟發性：「一門學科的進步與拓展真正的關鍵端賴實質問題的解決，而重要實質問題的解決經常又帶來方法的改革與創新，然後才輪到方法論對這些成果加以事後先見之明式的理論說明及辯護。」<sup>24</sup>

如劉子健先生所提出對於「史無定法」的進一步修正，認為「史採佳法」，要因題制宜。<sup>25</sup>因此，史學在與社會科學及科際整合研究取得一個平衡就必須不斷藉助社會科學的方法，在不過份依賴的前提下，從中發現問題，實際進行解決並且採用最佳的方法，而這還必須要仰賴往後史家們的努力，共同完成這個偉大的目標。

### 20. 歷史研究能否避免價值判斷？有價值判斷在內的歷史著作是否牽涉到主、客觀問題？如果不做價值判斷，依你之見是否盡了史家的責任？

在談論歷史研究是否能避免價值判斷就先必須定義主、客觀的問題。就黃俊傑先生提出所謂「合法主觀」的定義以下四種：第一種是課題選擇的時候所出現的「合法主觀」。比如說一個史學工作者閱覽資料決定主題，必然有個人切入的獨特觀點和重心，這個過程本身有主觀成份，這是「合法的主觀」。第二點，劃定收集範圍的「合法主觀」。史學家以研究的主題作為依歸，決定史料的層級性，

<sup>24</sup> 參照自陳貞陵：<http://wuming.nongtong.com/class/se5.html>。

<sup>25</sup> 參見劉子健，〈史學的方法、技術和危機〉，收入康樂、彭明輝主編，《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123。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有時候也會介入主觀性的判斷。第三點，資料選擇時候的「合法主觀」，比如他蒐集了八個資料，他決定用四個，這要憑著他自己的學術訓練來加以判斷。最後則是史學家對史料作綜合判斷的時候的「合法主觀」，史學家研究無數具體而特殊的個案，他要對整個時代提出一個大的判斷，這種判斷常常是綜合性的，這種綜合判斷可視為一種「合法的主觀」。

在「客觀性」方面，歷史研究中的客觀性的確切意思，是指歷史研究的方法有它邏輯上的確定性，它是不因個人的心理因素、情感、偏見而被扭曲的。而歷史研究中的「客觀性」，是通過研究者的「主觀性」，特別是研究者「合法的主觀性」所建立的「客觀性」。換言之，歷史研究中的「客觀性」，是經由研究者心靈的建構而折射出來的「客觀性」。因為歷史事件本身沒有動力，是歷史學家而不是歷史事件才是歷史知識建構的主角。只有研究者才是主角，歷史事實沒有內在的動力，就好像佛教華嚴宗的《金獅子章》所講的：「金無自性，隨工巧匠緣，遂有獅子相起」，是因為工匠的關係才有各種形狀。歷史的記憶無止盡，只有歷史學家才是歷史資料的主宰者，因此歷史所謂的「客觀性」，如果沒有史家的「合法主觀性」作為基礎，就不可能被建構。理論上來講是這樣，這裡會創生出很多問題，和理論問題可以互相聯繫上，所謂歷史研究中的「客觀性」，是以史家的「合法主觀性」而建構的。這樣的話，「主」與「客」的關係就不是一個機械的關係，而是一個有機的關係。這樣一來，問題就更加複雜，因為史家是血肉之軀，而且史家是社會文化經濟網絡的產物，那麼，歷史研究中的客觀性如何保證呢？

歷史事實的重建必須有賴於史家對史料的研究與研究課題的選擇，它是一種與個人的感官沒有關係，而與史家的思考、文化背景等環環相扣的。歷史事實的重建，是研究者所選擇的「有意義的行為」，因此必然和價值判斷無法分離。因此，如果史家的歷史研究中缺少價值判斷，探討歷史的真相便會喪失其真正的意義，只是個空洞罷了。<sup>26</sup>

<sup>26</sup> 黃俊傑，《歷史思維、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臺北：時報出版社，2006），頁 21-24。

21. 歷史需要解釋，但史家對於歷史所做的解釋又常遭受質疑，其原因為何？

許多人懷疑歷史著作並不能忠實的敘述過去的實況，因此史家的價值判斷和歷史解釋，也只是反映他的個人觀點而已。歷史解釋真實性常受懷疑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事件的實況，永遠比歷史更為豐富，史料既不能完全得到，也不能完全容納於歷史著作中。

第二、歷史著作中所表現的架構及連續，並不與事實的架構與連續有真實的平行關係。

第三、史學家寫歷史時必須用價值判斷，價值觀往往僅反映現在及未來可能有的意識形態，與過去並不相干<sup>27</sup>。

第四、研究對象的選擇，特別是人類事務的研究，無疑是由一文化之性格所控制，並且有時為研究者的社會地位所影響。

第五、研究並非在智識真空中進行，不論是誰，在從事研究時，其所有智識和指導觀念大多皆得自其所屬的文化。

第六、研究所用的有效標準，無疑與一文化的其他特色有因果關聯，而社會地位，階級和民族偏見，以及世界觀也每每左右一個人所接受的結論<sup>28</sup>。

第七、歷史並不是科學，它無法用實驗或精確的數據來解釋一切所發生的現象。

22. 中國「史」字的意義指涉，大要而言，經歷了三個階段。由最初之指涉「人」（史官）而至指涉「書」（史書，史籍，史冊），近代以來，復又轉至指涉「事」

<sup>27</sup> 甲凱，〈史學通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74，頁143。

<sup>28</sup> 萬年青書廊選譯，〈歷史哲學與歷史解釋〉，台北，寰宇出版社，頁19~21。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史事，歷史，史事)。試析論其「史」義指涉轉折之意涵與背景。

「史」字的原義，在先秦時本指「史官」，並無稱「書」之義，「史」字之稱「書」，合稱「史書」，有其複雜之變遷過程。「史」字自漢初以來，早已流入：就人而言，流入史、椽之屬；就文字而言，稱為「史書」，即小學文字屬性之書。時間愈前，史書指的多是為吏所需用的文字書寫，而愈趨後，則多指識文字之學與書法藝術。日人富谷至在〈史書考〉一文中，以為「史，令史，漢代掌文書的低級官吏。史書，指當文吏所必須掌握的文字書法」的解釋是最近真實的原意。而勞榦先生在〈漢代的「史書」與「尺牘」〉一文中，也認為漢代「史書」一詞的用法，除指文字書法的應用之外，主要還是從秦尉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之「史」的資格而來，「史書」是得以成為「史」的一個要件，亦即「史書」是指「史」用來書寫的文字與其所書寫之成物。總之，它決不是魏晉時代史部範圍內的「史書」、「史籍」之意涵，因為後者指的乃是記載歷史之典籍。<sup>29</sup>

23.坊間近有一本英國史家凱斯·詹京斯的《歷史的再思考》，論者咸曰此書是後現代史學的著作，其觀點在「歷史真相」上正好與西洋近代傳統史學有著針鋒相對的持論。試述你（妳）的看法。

Jenkins 的《歷史的再思考》，從後現代角度思考「歷史的本質」，即「歷史是什麼？」。傳統史學將「歷史」與「過去」劃上等號：「歷史＝過去」；換言之，史家認為「歷史是研究過去的真實」。Jenkins 的立論點卻是「『歷史』不等同於『過去』」。原因有三：首先，Jenkins 提出「建構」與「再現」的論調：因為過去已經

<sup>29</sup> 資料取自李紀祥，〈《太史公書》由「子」之「史」考〉，《第四屆史學史學術研討會》（台中，中興大學，1998）。

## 102-1 宗教中學--「史學導論」

成為過往，歷史是書寫過去的文學，是史學家賦予過去意義，所以歷史是建構過去的一門學科，即創造真相，並非發掘真相。再者，Jenkins 認為歷史有一定的立場選擇，造成歷史是為某人而書寫。如同，近代國共戰爭的歷史爭論、喋喋不休的中日抗爭論述、二二八事件的白色恐怖，似乎說明了 Jenkins 的立場—歷史有著一定的立場選擇。先以相撲為前引：相撲歷史最早追溯至日本「古事記」，當中記載著兩位大神以角力決定國家由誰掌管。所謂相撲（sumo）是指兩人在土俵中角力的一種格鬥技，土俵的正面是北方，南方叫正對面，即裁判所站的方向。雙方力士在土俵範圍內被分為東、西兩邊進行一場對賽，雙方選手使用撞、擠、推、摔等技術，當一方將對手扳倒或推出土俵外即為勝者。基本上，勝利的判定以一方腳底以外的身體其他部份先觸到地面或土俵以外，或者是使用被禁止的招式皆判定落敗。任何一樁歷史事件如同土俵，當事者如同雙方參賽的力士。彼此被歷史事件框限出一個又一個的土俵，圈限出彼此的立場選擇，彷彿化身為土俵內競逐勝利的力士，交叉運用著撞、擠、推、摔等技術，形成一套自我防衛與攻擊的策略，做為致勝的關鍵。此時，相撲場上似乎形成一股「非贏即敗」的對立氛圍，直到勝負已分，鼓譟方休；「勝利的桂冠」似乎不單指涉「榮耀」這個符碼，甚至代表「贏家取得事件詮釋權的合法性地位」。此刻，「勝利的桂冠」宣示著「歷史真實性」的確立。

然而，Jenkins 似乎忘記「裁判」的存在。一場競賽的勝負判準與裁判休戚與關，由於今日雙方是競技選手，自然有勝負可言，倘若以裁判—第三人角度，勝負不關己的態度，公平地評判這些比賽（歷史事件），那麼客觀性是否能存續賽事當中？或許是另外一種思考面向來看

Jenkins 提出的第二論點—歷史有一定的立場選擇，造成歷史是為某人而書寫。最後，Jenkins 認為任何人都無法神入（empathize）古人情境，理解古人想法。他以「再現」的後設思維，認為史家只是「嘗試以自己立場」設身處地的理解古人想法，最終的歷史書寫「終究仍為史家的立場而解釋」。關於這點說明，眾人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似乎無從考證，畢竟逝者已以，徒留來者可追！

Jenkins 基於這三點論述，認為歷史頂多達到「真實效應」(Reality Effect)，立論皆環扣著「歷史不等同於過去」的層層推論。此書最有趣的地方在於，作者本身「明確的思維邏輯」與「嚴謹的層層論述」試圖耙梳出「歷史與真相的連結點」；然而，一開始在導言中，作者便說明本書以「後現代角度」觀照歷史。兩者（思考及寫作形式 VS 後現代導言）相較之下，卻與後現代的「去中心化」論述，有著弔詭之處。附帶一提，對於看待「歷史的本質」這件事，Jenkins 確實不為歷史下一個終結性定義。<sup>30</sup>

**24.歷史知識可能客觀嗎？可的話，史家自主性何在？不可的話，歷史如何能成信史？請說明你的看法。**

柯靈烏在《歷史的理念》一書裡曾說：「歷史是在史家心靈中重演過去的思想」，認為歷史事實、知識，必須在史家的理解下才得以展現，因此無法與科學事實完全類比。在歷史研究裏，「客觀性」是一個經常被使用的詞彙，其定義與科學研究所謂的「客觀性」並不相同，而自有人文學的內涵。

歷史研究中的「客觀性」，是通過研究者之「主觀性」（合法的主觀性）所建構的客觀性，在此合法的主觀性下，歷史知識是可能客觀的。原因在於，歷史事件本身沒有動力，因此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史家是歷史資料的主宰。「客觀性」如無史家的合法主觀性作為基礎，就不可能被建構。而歷史事實的重建，必須經過史家對史料與研究課題的選擇，是一種與感官無涉，而與史家之思考與文化背景等相扣的有意義行為，史家在此則擁有相當的解釋空間。

歷史事實的重建，是研究者所選擇之有意義的行為，因此必然與價值判斷無法分離。在從事歷史研究的過程中，它是一個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

<sup>30</sup> 資料參考取自 1981 說書人部落格：<http://blog.roodo.com/sidneylee/archives/2382397.html>；<http://blog.roodo.com/sidneylee/archives/2382431.html>。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知識活動：歷史知識的意義，必須經過研究者的解明才能被發掘；研究者之歷史性，必須藉由與歷史文本的對話才能夠彰顯。嘎達謨認為：「經典之所以能歷久彌新而取得超時間性格，乃是因為歷代皆有人閱讀它，對之提出問題」、「經典的超時間性是在時間性中展開的」，嘎達謨所言原在論述經典的時間性與超時間性之辯證關係，然對我們思考歷史經驗作為「文本」與讀者的互為主體性卻也有另一方法論上的啟發。

歷史研究中，事實（Facts）與價值（Value）之間具有三個層次不同的關係：

（1）不可分割性：例如探討秦朝為何建立萬里長城的問題，必須追索秦人反對北亞游牧民族南侵的心態，才不致漏失此件史事的內在背景。（2）不穩定性：因為歷史事件的價值是研究者所擁有並賦予的，因此有時會被史家私人的價值觀所扭曲。（3）相互競爭又互為創造的：歷代史家懷抱著不同的價值進入文本，使文本中未經開發的意義獲得彰顯。<sup>31</sup>

25.民國初年以來思潮普遍充滿泛科學主義，史學界遂有：「史學便是史科學」的說法盛行；您同意這樣的看法嗎？何謂史料？它和史著的關係為何？請試述之。

科學的縝密方法，讓科學取得空前的成就，影響著民國以降的史家應用科學方法治史，使民國以來的史學研究突飛猛進，並在史學界有著「史學便是科學」的說法。提倡科學方法治史的胡適，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影響了中國史學界的治史觀念，但也值得商榷。其因在於科學方法具有一般性，即包含觀察、實驗、歸納、比較、分析、綜合，以到達精確，任何人使用同樣證據，在同樣情況下，是可以得出同樣結論，有其普遍性的結論，但史學則否。史學知識

<sup>31</sup> 資料取自黃俊傑個人網站的課程資料：[huang.cc.ntu.edu.tw/pdf/CCB3011.pdf](http://huang.cc.ntu.edu.tw/pdf/CCB3011.pdf)。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難以具有普遍性，兩位不同的史家，解釋相同的史料，所得的結論殊異。而且史學家所能掌握的史料，永遠殘缺不全，往往缺少關鍵性的史料，因此史家即使能充分運用科學方法，也無法克服史料不全的難關，而得到類似科學的精確結論。故科學方法或許可以幫助史家得到較精確的結論，是史家得以應用科學方法的地方。但如果認為史學應用科學方法，可以充分驗證各類史料，可得到科學性的結論，那就是大錯特錯了。<sup>32</sup>因此，「史學便是科學」的說法，大有可議之處。科學或許可以透過反覆觀察而得到相同的結論；但歷史的因素繁複，過程駁雜，無從隔離起來，以作個別片段的試驗，是不能與科學等量齊觀的。

主要指的是留存下來的實物（即史料），包含舊史、金石文字、國家或私人檔案、家譜、租簿、帳冊等。其與史著之間的關係，在於史料呈現「文字」記載，而非實物，並透過記錄者之手或史家之筆進而留存。但其整體性與可靠性，常受到外在因素及內在因素的影響。外在因素如：印刷品質不良，導致史料記載遺漏、政治力的干擾，導致史料所反映的事實呈現不實等。內在因素如：史家的客觀性與記錄能力有待商榷、並非所有歷史都被史家記錄下來等。

### 26. 史學家和文學家都要講究文字的運用，那麼史家之文和文學有什麼樣的不同？

在中國傳統史學中，《史記》是一本兼具文學之美的史著，司馬遷迭宕有俠氣的文字，固為文學研究者所推崇，但畢竟是史家之文，和宋代盛行的史論自有所異，史論文字一般均過度誇大其詞。清代學者章學誠有云：「史家之文，惟恐出之於己，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這是史學家和文學家最大的不同。關於這一點，章學誠曾用「茅黃葦白」來指責文人寫史的風氣；劉知幾在《史通》中，

<sup>32</sup> 參考自杜維運，〈歷史科學與藝術〉，《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臺北：三民書局，2005），頁45-54；〈史學方法科學方法與藝術方法〉，頁54-65。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亦批評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大著作」們，以駢儷文體撰史之不當。大抵而言，文人之史，踵事增華者多，樸質實錄者少；正因如此，使得文人之史充滿浪漫情懷，而稍稍遠離「多聞闕疑，慎言其餘」的實錄史學傳統。<sup>33</sup>

要言之，史家在文獻徵引上，史實與傳說，文獻與作者個人的意見是區分的；而有關前人的研究，史家必須地氈式爬梳，不可信手拈來，也要了解歷史研究的行情。因此，就歷史學的角度而言，以上諸點是史家對文字的運用所著重的。另從文學的角度來說，誇大的文學修辭，文化恐龍症式的感慨，過度華麗的辭藻，可將史實與傳說相容不分，悠遊於過去與現在之間，這是文人之史、文學之史，也多可不必爬梳史料，隨手的創意之作，常常製作出意想不到的效果，豐富了閱讀人的視覺刺激，而這也是史與文不同之處。史必須講求出處、證據，文則否，以意境、優美為先，這是兩者的異處。

**27.新史料的發現往往能夠填補歷史的空白，或修正過去的錯誤。請任舉一、二實例說明。**

(1) 秦漢簡牘：出土的有敦煌漢簡、居延漢簡與羅布泊漢簡。

秦漢漢簡於清末，在甘肅、敦煌、居延及新疆羅布泊等皆有出土。首先，敦煌漢簡於斯坦因的四次西北行考察(西元1900—1930年)，在第二次之行(西元1906—1908年)於敦煌墓址得漢簡705片。第三次，民國元年(西元1912年)在敦煌、酒泉各得84、105片。沙畹(Eduard Charanwes)(法)，將敦煌漢簡編成《斯坦因所獲中國簡牘考釋》。羅振玉、王國維再據上書編成《流沙墜簡》，並加以考釋。王國維首先利用此書中的漢簡、金文、甲骨文等研究漢史，開啟利用新史料研究歷史之風，並填補歷史的空白。其次，居延漢簡於民國19年(西元1930年)，由北

<sup>33</sup> 參考節取自吳鳴弄堂(政大彭明輝教授): <http://wuming.nongtong.com/liter/lc4.html>。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平中國學術團體協會及斯文赫定(Sven Hedin)組成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居延得漢簡2萬多片，並收錄於勞榦《居延漢簡》。再次之，民國19—23年（西元1930—1934年），黃文弼在羅布泊北岸，漢邊塞舊址，前後兩次得71片。

(2)《天聖令》：天一閣博物館發現，還原唐代法律樣貌。

在偶然的機會下，上海師範大學戴建國教授，為研究宋代的官職制度，到天一閣博物館，找到明代的抄本《官品令》10卷。但在抄寫研究後發現，這本名為《官品令》的書，實際上是北宋天聖(西元1023—1032年)年間制訂的「令」，即稱《天聖令》，書後則還附有唐代的《開元令》(開元為年號，西元713—741年)，學界一致認為這是個驚人的發現，在此之前一般均認為唐、宋的「令」早已掩沒。因為「令」是唐朝人民生活的重要規範，可以反映當時人民生活的原貌。如田令、藏庫令、廄牧令、關市令、捕亡令、獄官令、營善令、喪葬令、雜令等，幾乎囊括了有關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全部法律，對於唐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它填補了法制文書的不足，對唐朝歷史和中國古代法律史的研究，以及對古代全面學習中國法律的日本「令」的研究復原，都是重要的史料。

### 28.何謂歷史想像，並說明其在史學研究上的重要性及局限。

所謂歷史想像，就是史家將自己放置於到歷史之中，進入歷史的情境與模擬歷史人物，然後由此想像當時可能發生的一切可能，這是理解歷史的一個方式。以此，將失佚、不全的史料融合、連貫起來，使歷史書寫合於邏輯。歷史想像的重要性，在於重構歷史現場，幫助史家了解過去的進程。不過，它的問題與侷限也在於「想像」，因為多是賴於歷史材料的蒐集、累積後，進而擇取、解讀、分析、解釋歷史材料，掌握這些零碎的物件，才使歷史重構有時序性、不悖常理。它的客觀性與公正性，很難獲得全面的肯定與證實，資料的真實性是受到懷疑的，這是歷史想像的侷限。

### 29.試說明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互補性。

將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當成輔助歷史研究的工具，影響學界甚鉅。社會科學方法或理論，對於史家有啟發的作用，使史家洞徹個別歷史事實的意義，從而形成歷史解釋。不過，社會科學的理論，應用到歷史研究上，不能當作完全的因果解釋，也不能作為普通法則來使用，只能當作假設。社會科學家無法訂出一些具有全面解釋力的通則，而他們的不完全與使用的方法、概念，正是史家得以省思、取徑之處，從而解釋歷史，也幫助社會科學家認識他們的理論、方法是否有瑕疵與不足之處，進而盡可能的充實，也能讓史家得以運用，以解釋歷史與其意義。

### 30.自從社會科學發方法逐漸被引入歷史研究後，傳統史學家由抗拒到批判性地接受，直至二十世紀後半期，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已呈交流並進的趨勢。請問在這段期間，傳統史學曾遭遇那些強烈的挑戰？歷史學又發展出那些新的研究領域？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新舊歷史之爭，從涉及的內容到應用的方法，是歐美史學界的論戰焦點。新歷史有三大流派，一為量化史，一為社會科學史，一為心理史，三派皆有嶄新的方法，歸屬於社會科學的範疇。量化史採用量化分析法，分析大量的資料，統計出來可觀的數字，電腦變成最重要的工具，有著歷史電腦化的呼聲。社會科學史採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尤其採用社會學與人類學的方法。心理史採用心理學、精神病學、心理分析等學問的研究方法，深入了解個人與群體之間的行為。三派的新史學方法，重點在分析，且有許多量化數據、統計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表、社會模型、口頭訪談、心理分析等理論，較傳統史學著重在資料的排列、搜集、歸納與書寫，新史學提供了新興工具，使傳統史學面臨嚴重挑戰。

在這段社會科學與傳統史學相互衝突、矛盾、到融合的時間，史學的研究領域也開始發生變化、擴展。歷史開始從下層寫，寫被忽視的大眾，探討他們的社會問題、城市與社團、宗教信仰、性生活、生與死、老與幼、罪犯與瘋癲等。近期，則以宗教禮俗、疾病醫療、性別史、社會生活史、基層社會等面向，為史學界所關注。

31.請分析說明十八世紀以來西方史學界何以興起「科學治史」的主張？此派理論的內容重點為何？以一位今日有志於從事史學研究的學習者而言，你（妳）認為應該採用何種態度去對應此種主張？

近代西方科學的發展，對「歷史」這一門古老的學科有著「革命性」的影響，「歷史」不再被某些人視為「藝術」的一個分支，而被賦予新的生命，即企圖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歷史。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89-1857)所創立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其基本思想是把科學從形上學和神話中區分出來，因此孔德將人類歷史區分為神學、形上學和科學三個階段，即神學的社會、形上學的社會和實證的社會，而孔德所強調的「實證的」卻有五種意義：(1)現實的而不是幻想的；(2)有用的而不是無用的；(3)可靠的而不是可疑的；(4)確定的而不是含糊的；(5)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實證主義者通常認為，只有現象和事實才是實證的東西，也是一切認識的根源，只有透過經驗而不是透過理性才能把握和感覺材料，科學知識才是「實證的」。因此，他們認為一但用此一方法發現制約人類社會的規律，就能夠使國家掌握歷史的方向，並預知歷史的進程，希望同自然科學一樣有一套有效的規律來解釋歷史。

## 102-1 宗教中學--「史學導論」

蘭克史學受實證主義的影響，但又不同於實證主義史家，實證主義史家將歷史視為科學後，蘭克史學中的科學性被誤解了，然而其所謂的科學非一般的自然科學，而是具有特殊精神的人文科學，如果不辨此義，勢必將蘭克視為科學歷史學之父。蘭克的史學觀首先區分歷史與哲學的方法，他認為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有一種符合神意的全體，是上帝的作品，史家的責任是去感知上帝的神諭，蘭克的宗教信仰對其史學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蘭克史學中對史料考證的重視，往往被誤認為是對客觀性的追求，其實蘭克史學的客觀性與科學的客觀性是有分別的，蘭克總結當時歷史批判方法和語言學者考據的方法，透過對史料的直覺領悟，希望能達到消滅自我，而呈現出客觀的歷史，這是一種堅定樂觀的理想，也難怪海登·懷特(Hayden White, 1928)要稱蘭克為「喜劇式歷史寫實主義」(Historical Realism as Comedy)史家。

蘭克史學的影響莫過於對史學專業化的貢獻。蘭克本人並未刻意形成某種學派，但其漫長的人生，龐大的著作，以及蘭克在教學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卻在他身後形成所謂「蘭克學派」，這是他始料未及的。此一學派並無嚴格的定義，其最大的特點即是通過史料考證的方法，能如實的反映歷史。

在中國，近代史學的展開自日本轉介後，隨後又自歐美引進不同的史學方法與理論，而引介的過程中，對蘭克史學的印象，一轉再轉，不免人云亦云，或以己意揣度，恐早已遠離蘭克史學的本意，但不論學者對蘭克的論述正確與否，此一過程不正也顯示出，西方近代史學是如何透過各種渠道被引介進中國，然後史家又是如何調適，並加以吸收和解釋，這才是我們探究與了解蘭克史學的真正意義。<sup>34</sup>

### 32.請舉實例以說明何謂「歷史敘述」？何謂「歷史解釋」？它與歷史敘述在歷

<sup>34</sup> 參考節取自楊志遠，〈蘭克的史學及其影響〉，《吳鳳學報》，11（彰化，2003），頁 35-42。網路資源：140.130.128.66/files/05.pdf。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史研究中，各有何重要性？如何圓滿的將兩者充分運用到歷史研究中。

所謂歷史敘述，一般而言，是敘述以往發生過的事件，例如《史記·項羽本紀》載：「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這是歷史敘述的一例。

歷史解釋與歷史敘述是歷史的兩大要素，呈現於世人之前的歷史，無法超出兩者。<sup>35</sup> 所謂歷史解釋，大致上是闡明歷史發展的軌跡及其意義所在，例如《史記·六國年表》序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即是歷史解釋的一例。

歷史敘述與歷史解釋是歷史的兩大要素，史家須同時具備歷史敘述的技藝與歷史解釋的藝術，彼此是相依為命的關係。歷史敘述的真諦，在於史家如何運用敘述的技藝，描述整個歷史現象；歷史解釋的真諦，則是對歷史事實的敘述，做後設的疏通陳述。歷史解釋與歷史敘述兩者相依相存，誰也離不開誰，缺一不可。在研究上，史家透過記錄之某事，將歷史真實的呈現，並在深入研究歷史上某一問題時，透過嚴謹分析與反覆討論，融合解釋與敘述的藝術，使兩者圓滿的運用於歷史研究之中，乃為史家技藝最佳之呈現。

33.關於史料，近代十分重視，並頗強調其價值、意義，大約近六十年來，頗流行一概括性命義，即「史料便是史料學」，此說首見於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

<sup>35</sup> 以下參考節取自杜維運，〈歷史敘事與歷史解釋〉，收入氏著，《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臺北：三民書局，2005），頁 225-247。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第三頁；蔡元培亦有「史料本是史料學」之說，見於《明清史料》〈序言〉。請問：你對他們的說法有何意見？

在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先後曾出現過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響最大的則有兩派：第一派可稱之為「史料學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訂與辨偽為史學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稱之為「史觀學派」，乃以系統的觀點通釋中國史的全程為史學的主要任務。

從理論上說，這兩派其實各自掌握到了現代史學的一個層面：史料學是史學的下層基礎，而史觀則是上層建構。沒有基礎，史學無從開始；沒有建構，史學終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學與史觀根本是相輔相成，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但是在實踐中，中國現代的史料學派和史觀學派由於各趨極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銳的對立。史料學派鄙史觀為空中樓閣，而史觀學派則又譏史料學為支離破碎，不認大體。我們不能在此對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得失展開全面的評論，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這兩派在現代中國史學史上所產生的某些流弊依然在泛濫中。因此對這些流弊略加檢討，以為今後史學發展的借鑑，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史料學派的最大特色在於他們的史學和時代完全脫節。主要由於他們對於史學上所謂「客觀性」的問題的了解有其局限性，他們假定歷史事實是百分之百的客觀的，可以通過科學的考證而還原到「本來面目」。如果一切事實都考證清楚了，那麼全部的歷史真相自然會顯現出來。因此我們可以樂觀地等待著「最後的歷史」(ultimate history)的出現。正是根據這一假定，史料學派才否認史學和時代之間有任何關聯。這一學派的人深信，純粹客觀的史實既能通過一定的考證程序而恢復其「本來面目」，則史學家因自身所處的時代而產生的一切主觀因素都已被摒除在史學之外了。我們承認，有些所謂歷史考證的工作，其具體結論的正確與否的確是不受時代影響的，如名物制度、訓詁校勘、地理沿革、人物生卒等種種方面的具體問題，一旦獲得了正解，便再也不會隨著時代而更動。但是這一類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的考證雖然都涉及史學家所必備的基本事實(basic facts)，卻不足以當「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之稱，因為這些基本事實只不過給歷史提供了一套外在的架構，它們本身並沒有內在的意義，即不能說明歷史的變化，而且即使是這一類的考證，其興起與發展仍不能完全脫離時代。我們不免要追問：史學家何以在某一個時代對某一類的名物、制度、典籍、人物、地理發生了特別的考證興趣呢？史料學派不但誤認一切基本事實為歷史事實，而且對每一事實復盡量作孤立的處置。因此他們主張「證」而不「疏」。在「史學即史料學」的理論支配之下，他們的「證」的範圍則退縮到材料的真偽這一點上。在這種情形下，真正的史學研究是無從開始的。因此，史學是脫離不了時代，歷史事實之所以成為歷史事實，是和史學家對它的了解分不開的。歷史事實無窮；相對於任何一項歷史上的變化與發展而言，史學家經過反覆的研討，才在眾多的歷史事實之中發現它們之間主從輕重的複雜關係。發現這種關係便是對歷史現象作出了最卓越的解釋。《書經》所謂「疏通知遠」，司馬遷稱《史記》的目的在「通古今之變」，其中心的涵義即在於是。所以我們雖然同情史料學派對「證」的強調，但是卻絕不以此為史學的止境。今天的史學家一方面要用最嚴格的實證方法來建立史料，另一方面則要通過現代各種學科的最新成果和時代的眼光來「疏通」史實與史實之間的關係。<sup>36</sup>

34. 二十世紀史學家輩出，請舉出一、二位重要歐美史學家，並說明其對今日史學研究的重要貢獻。

(1) 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 1925-2006)，杜希德又譯崔瑞德，歷任劍橋大學漢學講座教授和普林斯頓大學胡應湘漢學講座教授。他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執英

<sup>36</sup> 參考自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原載《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收入康樂、彭明輝主編，《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1—19。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美的唐史研究和中國的通史研究之牛耳，為漢學界所公認，而其領導漢學的研究潮流之傑出貢獻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第一、為與已故哈佛的近、現代中國研究鼻祖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珠聯璧合，共同主編十五卷本《劍橋中國史》（尚未出齊）；第二、為在二次大戰後使歐洲與《通報》（T'oung Pao）比肩的漢學名刊《泰東》（Asia Major）復刊，並親任主編，直到二十世紀末；第三、為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主編《劍橋中華文史叢刊》（Cambridge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已出版約五十種專著，刊頭題字者不是別人，正乃是已故耶魯漢學巨擘傅漢思（Hans Frankel）夫人、海外名書法家張充和（亦即香港名報人兼鑒賞家董橋對其文人書法推崇備至的「充老」）先生。杜師慧眼識英雄，廣結善緣，通過這一套世界級學術叢書，識拔和培養過分佈在歐、美、澳、亞各洲的一、兩代年輕的學人，後來不少都成為出類拔萃的漢學家，外國人中不乏麥大維（David MacMullen，現任劍橋大學漢學講座教授）和費思綦（Stephen Fitzgerald，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漢學教授、中澳建交後首任駐華大使）這樣響噹噹的名字，而華人中則包括如今名聞遐邇的黃仁宇（黃氏在其身後出版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對此有詳細記錄）和王汎森（英國皇家學會院士、中研院院士、副院長）等在內的第一流人物。杜師的輝煌的學術生涯，起於劍橋，終於劍橋（他榮休之後，離開美國，隱居劍橋），而中間普林斯頓度過的全盛時期，則努力將劍橋漢學匯通於美國的主流學界，其溝通英、美漢學研究的功德，當世無能出其右，如今緬懷，即使稱之為「杜劍橋」，亦當之無愧。<sup>37</sup>

（2）牟復禮（Frederic W. Mote, 1922-2005）為二十世紀後半葉歐美漢學的大師之一，但他從來不揄揚自己。在大陸和香港，很多人知道普林斯頓是西方的漢學研究重鎮之一，但較少有人注意到普林斯頓的漢學研究的歷史其實相當短，

<sup>37</sup> 參考自陳珏，〈歷史與空間：劍橋漢學與「島夷威酋」——劍橋漢學緣之一〉，〈文匯報〉  
<http://paper.wenweipo.com/2006/07/01/OT0607010001.htm>。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是在二次大戰結束、牟復禮到任以後才開始的，更少有人知道普林斯頓的漢學研究之所以能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取得今天的成績，乃得之於牟復禮教授筭路藍縷的開創和始終不倦的推動。他對於西方漢學的貢獻，主要圍繞在建立普大成為美國，甚至是西方漢學的研究重鎮，可與英國劍橋相互媲美。以下，約可分述為三個方面：第一、讓普大東亞系成為西方漢學的研究重鎮。普大東亞系草創之時，牟教授有一句目標性的名言：五十年以後，研究中國要到普林斯頓來。如果說普林斯頓漢學研究的成功與牟復禮有關，那牟復禮的成功，則與他博大的胸襟有關。一如牟教授所預言，普林斯頓的漢學於上世紀末到達全盛時期，就史學而言，余英時教授治漢史、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教授治唐史、劉子健教授治宋史，而這三位西方最頂尖的中國斷代史大師到普林斯頓任教，共襄盛舉，都與牟教授的精心設計和極力延請有關。這幾位教授，加上牟教授本人，遂使美國研究漢、唐、宋、明史的權威雲集在一個校園裡，真所謂人才一時之選。唯有真不忌才之大胸襟者，方能夠做到這一點。正因為牟教授能夠如此，才使普林斯頓的斷代史研究格局，在牟教授榮休之後，仍能持續地發展。第二、牟復禮是西方漢學的明史權威，又是一位學術興趣十分廣泛的通儒，在香港中文大學服務的朱鴻林，便是他在華文世界的得意門生。牟復禮他那口略帶北方口音的純正國語，當年得之於趙元任的親授。在他退休之後，隱居科羅拉多的小羊山中頤養天年，但每年春天仍以榮休教授身份回校，參與學術活動。第三、牟復禮敬重同事，風度人所共知。牟教授八十年代末榮退後，余英時來到普林斯頓，任校聘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余教授是漢學界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雖然早期研究以漢代為中心，其實對各個時代的許多領域裡的尖端問題都有極深入的研究。牟教授對此十分推重，他讚歎過「Professor Yu is for everything」（余教授無所不通）。這種大師之間的互敬之風，言傳身教感染和薰陶了數代學生。其中，牟先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哈佛費正清（John Fairbank）主持的學術研討會上，初遇劉子健，就認定「劉先生是試圖將全數的中國傳統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史學和西方社會科學所發展出來的知識工具結合起來的人物」，隨後一九六三年兩人在香港重逢時，牟先生的誠意終於促使劉先生作出離開史丹福，轉任普林斯頓的決定。這其中牟先生對劉先生的推重和上面的對余先生的推重，何其相似乃爾。<sup>38</sup>

35. 歷史學家在建立史實之間的因果關係並提出歷史解釋時，可能遭遇那些問題？應如何解決？試以你自己的實際研究經驗為例加以分析。

歷史解釋是以從歷史的因果關係做解釋為其重要的核心內容，因為歷史不經過解釋，是無法被理解的，如同卡爾（E.H Carr）所說其認為歷史若沒有歷史學家去解釋事實，事實不過是死的，毫無意義可言。但是問題是解釋不是簡單的一個活動，歷史解釋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一套通則性的看法，而歷史解釋和歷史敘述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大多數的歷史著作，它都是既有敘述又有分析又有解釋的。

而因果關係則是歷史解釋前的基礎，歷史是個討論變化的學科，討論人物事件和時間的關係，這種關係就是因果關係，因為有了前面的各種因素的聚成，進而導致最後的結果發生。而前因，又有分近因和遠因。舉例說明在探究造成安史之亂的原因，近因部分雖是玄宗任用蕃將，缺乏戒心，給予過多權力，並且任其自行坐大，最後加上楊國忠這條導火線，結果導致安史之亂的發生。但追根遠因，是因為武曌登基後的政策，府兵制的敗壞、均田制崩潰，埋下了興盛內的危機種子，最終也就因為經歷安史之亂後，導致了唐代由盛轉衰的後果。雖然這二個執政的時代不同，外表看起來似乎是不怎麼相關連，但卻有著上下連貫的因果關係，也就是說這提醒我們在往後研究歷史時，不能光就單一事件妄下評論，而是

<sup>38</sup> 參考自陳珪，〈漢學家牟復禮雜憶〉，  
<http://www.wangf.net/vbb2/showthread.php?threadid=21660>。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要藉由觀察這件事情對整個大時代的動蕩影響，而分成以二種角度去看：一為因果關係的深度，另一為因果關係的廣度。但問題就在於觀察因果關係的解釋時，所牽涉的資料是相當龐大且可能是零碎的。而這點就必須有賴於史家除了進行史料文獻的考證與分析之外，仍要用自行的眼光評斷這當中的緊密關聯。學生認為歷史的因果關係是從人為的分析與解釋出來的。因此，歷史解釋尤其是以因果關係的解釋為它的核心。

36.有些史學家說「歷史」(History)與「虛構」(Fiction)沒有甚麼不同；又說「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都是「發明」(invented)出來的，其原因何在？

後現代史學常受人詬病之處，是它否定了所有千年來史學界想要求真的努力，認為所有的歷史，甚至文獻都是文本語言的產物，因此是不可靠的，也因此沒有高低之分。其最大的後遺症是，既然各種解釋都是有效的，沒有高低，只有不同，歷史是虛構的，史家何必花力氣去尋求真相？史家千百年來賴以自存及藉以得到尊嚴的基礎：對歷史真相的敘述及解釋權，到了此時被徹底推翻了，歷史作為一門學術項目對後現代史學者而言真是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懷特(Hayden White, 1928-)是後現代主義學者中比較有治史經驗的人，他不但寫過史學作品，也曾分析十九世紀歷史學家及歷史哲學家的著作，受到語言學、傅柯、巴特(R. Barthes)及文學理批的影響，他特別對歷史「想像」有所著墨：史實由文字語言表達，人是語言的使用者，凡涉想像，不能沒有虛構的成份。他曾說：「歷史敘事(historical narratives)一如其自身既已彰顯者，亦即其乃辭章創作(verbal fictions)之屬，而其內涵兼有意造(invented)與發現(found)」。他也很強調史學研究及表述過程中所使用的風格技巧，尤其是對類比及模型等「形式」(form)方面對於「內容」(content)的影響，提出類型學的說明，將史學家的重要作品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歸類其中。

總之，史學在研究歷史(history)與文學(literature)不分，史實(facts)與虛構(fiction)無異，所有的過去都可以「重寫」(re-describe)，歷史著作沒有優劣，只有不同，歷史是想像發明出來的，而不是有待史家去發現的。從 Hayden White 的言語中，可以深刻了解後現代歷史家，對於歷史是虛構的看法，以及他們為何從事文本考究的原因。<sup>39</sup>

37.近代中外史學在治史方法上最大的不同，是懂得利用其他學科以從事歷史研究。此外，以相關學問作基礎以解釋歷史上複雜而變幻莫測的多種現象，亦為眾家所樂用。此即所謂之歷史輔助科學，其種類繁多，相輔相成之程度亦各有所差異，請略加論述，並舉你熟悉的輔助科學為例說明之。

歷史是一門包羅萬象的學科，綜合各種學問，因此當我們在研究歷史時，除了遵守處理史料的基本原則之外，可以運用的方法也有很多種。劉子健的〈史學的方法、技術和危機〉一文提到三項歷史輔助科學：第一為年鑑學派，這是綜合各種社會調查演變出來的方法，主張認識社會，必須得其全貌。第二為量化學派，是以數字統計來綜合散在各方面的資料，運用大量的統計數字，經過公式的計算將其做成圖表等，以便分析。第三為心理學派，就是以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人的心理和行為，並與史實進行綜合分析。還有許多林林總總的其他歷史輔助科學，可說不勝枚舉，難以介紹詳盡。<sup>40</sup>

社會科學的量化方法，在歷史研究中頗為常見。史家綜合零散的資料，使用大量的統計數字，經過計算後將其做成圖表等，再進行分析。例如觀察一個地方

<sup>39</sup> 參考自古偉瀛，〈當後現代遇上儒家史學—新與舊的辯證〉，《東亞文明研究通訊》，臺北：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頁 1-13。

<sup>40</sup> 參見自劉子健，〈史學的方法、技術和危機〉，原載《新史學》1 卷 1 期（台北，1990 年 3 月），收入康樂、彭明輝主編，《史學方法與歷史解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 121-122。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的人口或社會結構的變遷時，可從人口的數字統計變化分析，如唐代安史之亂前後的南北人口數量的變化，便是一個可用量化分析作為輔助研究的例子。因此，在做歷史研究時，依照研究課題的需要，可使用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來輔助歷史研究。這樣，不但可以還原歷史的真實面，也可使歷史研究更為多采多姿。

38.請列舉一本你所讀過的中外史家論「歷史本質」的專書（古今皆可，專論、通論不拘），介紹其作者、內容重點並評論之。

馬克·布洛克（Marc Léopold Benjamin Bloch，1886年7月6日－1944年6月16日）的《史家的技藝》，被認為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史學理論書籍之一。馬克·布洛克這本遺著，旨在辯明一個是小也是大的問題：歷史的作用與功能。他一開始就把這個命題點明了：「告訴我，爸爸，歷史有什麼用？」（中譯本頁13，以下皆同）。在〈緒論〉中，他反覆闡明史學如何受人誤解：某些人認為歷史是「有趣的消遣方式」。所以布洛克認為，「歷史就必須證明其之所以為一種知識的正當性。」（頁18）也有人說：「歷史是知識分子的毒素所曾製造出來之最危險的化合物」。所以布洛克認為，「首要的目標是說明一個歷史學者如何與為何從事他的行業。至於這個行業是否值得從事，則留待讀者自行決定」（頁20）。

他認為這本書，是「一個喜歡反省日常工作的藝匠的備忘錄」，也是一本屬於「職工的記事本」（頁26）。布洛克為歷史學提出他的辯解：「歷史有它獨特的美學上的愉悅。構成歷史之獨特對象的人類活動，其壯觀場面最是設計來誘發想像力的，尤其是當它因時空遙遠而帶著那來自陌生事物的微妙魔力時。」（頁17）就文字而言，這是一段漂亮的說法，但不一定具有邏輯的說服力。接著他試圖說明史學的功用，以及如何說服非難史學的人：「就算歷史對人的物質生活或政治需求永遠沒有什麼貢獻，它對人之充分發展是不可或缺的」；「歷史必須不僅僅是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支離且……近乎無窮盡的舉例，而該具有理性的分類與進步的清晰性，只有在這種允諾下，歷史才能正當地在那些真正值得盡力的科學中佔有一席之地。」（頁19）從這段辯解文字中，很清楚感覺到，歷史學在布洛克的時代處於邊緣地位。其他「值得盡力的學科」，不僅懷疑史學的功用，也質疑它的「理性的分類與進步的清晰性」。傑出的史學工作者布洛克，在生命晚期花好幾年時間，在這本書中要「為史學辯明」（apologie pour l'histoire），同時也要說明「史家這個行業」（métier pour l'historien）的性質，所以同時用這兩個標題當作書名。

我覺得〈緒論〉和第1章，是本書最主要也最精采的部分。布洛克在這兩章中，清楚明白地完成書名所宣示的目標：「為史學辯明」，以及「史家這個行業」。以下的四章（包括未完成的第5章），我認為是技術性的細節，屬於史家的「技藝」。布洛克在那四章中，傳授（或記錄）他的實證研究工作心得與技巧，告訴我們如何做可靠的歷史觀察、如何辨明證據、如何考證、如何分析資料。換句話說，第2至第5章的性質，是布洛克這個「職工的記事本」。我認為這四章比頭兩章的「一般意義」少。從各章長短的分佈來看，他把大部分的篇幅，用在技術問題的第2-4章上，舉無數的實例，反覆說明歷史觀察與證據查證的要領。從篇幅的分佈上，也可看出布洛克史學研究的「技藝性」，遠高於哲學性的方法論。<sup>41</sup>

**39.試就所知論述近代西洋史學理論和方法的發展趨勢，特別是二次大戰之後，歐美史學界在研究理論和方法有何重大的突破？**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新舊歷史之爭，從涉及的內容到應用的方法，是歐美史學界的論戰焦點。新歷史有三大流派，一為量化史，一為社會科學史，一為心理史，三派皆有嶄新的方法。量化史採用量化分析法，分析大量的資料，統計

<sup>41</sup> 參考節選自賴建誠部落格：<http://blog.ylib.com/lai/Archives/2008/04/04/5733>。同文刊登在《中國論壇》，1989.12.10，29卷5期。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出來可觀的數字，電腦變成最重要的工具，有著歷史電腦化的呼聲。社會科學史採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尤其採用社會學與人類學的方法。心理史採用心理學、精神病學、心理分析等學問的研究方法，深入了解個人與群體之間的行為。三派的新史學方法，重點在分析，而非敘事，多是專題研究，較沒有時間色彩，作品則多呈現量化數據、統計表、社會模型、口頭訪談、心理分析等理論，沒有文章風格，缺乏動人情節，與舊歷史相較猶如兩極，這是歐美史學上的重大革命。

### 40.試說明傳統史學與新史學在研究領域及研究方法上之異同。

傳統史學在撰寫歷史，他們多著重上層的歷史，寫貴族和精英分子的成就，寫王朝、行政、法令、戰爭、革命等。新史學則從下層寫，寫被忽視的大眾，探討他們的社會問題、城市與社團、宗教信仰、性生活、生與死、老與幼、罪犯與瘋癲等。在研究方法上，傳統史學多依靠檔案、回憶錄、書信、講詞、法令、報刊、文集等資料，加以排比、歸納、整理，最後寫成敘事，以呈現歷史的全貌，也能吸引讀者。新史學則在檔案、回憶錄、書信等史料中，透過心理分析、量化統計、社會學等方法，建立理論，將這些史料分析、重構，以數據表、模型等方式呈現給讀者，雖較容易了解，但缺少可讀性。<sup>42</sup>

傳統史學和新史學的共同之處，即在新方法、新領域出現後，原本的新史學就會變成舊史學，舊史學則變成舊舊史學。在此，不是故意強調新舊之分，而是認為新舊之間的相承與創新上，隨著時間的前進與經驗的積累，它們都有可能遭到淘汰，或者併入其它的方法或理論中。從歷史的進程來看，傳統史學影響著新史學的形成與發展，新史學也承繼了傳統史學的特色，融入其它的方法、理論。而共同的願景與目標，即是希望承舊與創新，歷史能藉此途徑，實踐其淑世之理想。

<sup>42</sup> 參考節取自杜維運，〈史學方法的承舊與創新〉，《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臺北：三民書局，2005），頁 456-457。

### 41.試評述後現代主義史學。

在新舊史學的爭論方殷之時，後現代主義襲擊歷史，值得我們加以注意。後現代主義是對現代主義的反動，它不滿現狀，不服權威，勇於創新，是人類最叛逆的思想之一。初起在 1960 年代末期，涉及的範圍，包括建築、藝術、哲學、文學、史學、政治等領域。它影響歷史研究較晚，但最為嚴重，史家擔心後現代主義最低限度將摧毀歷史，甚至整個歷史事業都將摧毀殆盡。後現代主義認為歷史上沒有真理、客觀、真實，歷史是推論、意識形態的化身，史家的語言遊戲和文學作品的虛構沒有差別，這是驚人的言論。同時，他們從文本中，也不認為故事能敘述出來，歷史上沒有連貫、和諧、一致性等。史家認為的移情、想像，設身處地的進入歷史之中，後現代主義者同樣認為這是絕不可能的事，他們尤其堅持歷史對現在及未來沒有任何功用。持論如此，有人宣布歷史已經死亡，或者煙消雲散了。<sup>43</sup>

### 42.傳統史學與新史學之間的差異性為何？請論述之。

傳統史學的研究領域侷限於政治史，其記述對象往往為帝王將相的統治階層與貴族勢力，而忽略廣大的平民的過去。傳統史學記載的社會、文化、藝術等現象也多為貴族階層的事物，當時百姓的生活與文化並非是傳統歷史關注的焦點而少有論述，這種狹隘性促使本世紀初的歷史學家改變現狀，從非傳統的歷史角度來擴大史學的研究範疇。傳統史學強調歷史學以古鑑今的社會功能。古代的歷史學家相信歷史的功能在提供借鑑，可以作為指導政治家在與過去相同的形勢下應當採取的行動。此外，還能對民眾行道德教化與訓練。但是到了二十世紀的史家

---

<sup>43</sup> 參考節取自杜維運，〈史學方法的承舊與創新〉，《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臺北：三民書局，2005），頁 460。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逐漸改變這樣的看法。

現代的史家強調時代背景的差別，反對機械地援引歷史先例。由於時間的流逝，環境已經發生變化，與過去看起來相似的事情要進行不同的分析。因為執意尋找歷史的先例往往會強調表面的相似，而忽略時代的本質。新史學與傳統史學最大的不同在於歷史學研究對象的轉移，稱為「由下而上的歷史學」。由下而上的歷史學將注意力從統治者和菁英人物轉向普通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活動和經歷，也進而擴充了歷史學的領域範圍，並藉助社會科學等方法加以輔之，這是新史學與傳統史學的最大不同之處。

43.何謂史料考證？請你用約 300 個字簡要說明。

史料考證可分為外部考證和內部考證。所謂外部考證，是從外表衡量史料，以決定其真偽與產生的時間、空間等問題。所謂內部考證，係考證史料的內容，從內容衡量與客觀事實是否相符，或者他們符合的程度。史料的外部考證，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討論。一是文本真偽的判定；二是考證史料產生的時代；考證史料產生的地點；四是考證史料著作人的身分；五是考證史料的原型為何。史料的內部考證，則可從記載人信用之確定、記載人的能力與真實程度來加以討論。從內外的相互比較、比對，可以判斷史料的可靠性與真實性，也不會產生因不確實之病所形成的錯誤。<sup>44</sup>

44.從一位作者的引書格式，可以看出他書寫一篇文章是否注意細節，以及他博覽群書的功力。以下，試舉一本中文專書或一篇文章，以及一本英文專書或一篇文章，在 WORD 的當頁注中，你如何引用專書或論文？中英文分述之。

<sup>44</sup> 參考節取自杜維運，〈史學考證〉，《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臺北：三民書局，2005），頁 167-192。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

中文專書：杜維運，《清代史學與史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4)，頁 38-45。

中文論文：黃一農，〈中國科技史研究的新挑戰〉，《新史學》，14：4(臺北，2003.12)，頁 157-176。

英文專書：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02-103.

英文論文：Hoyt Tillman,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ü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3 (July, 1992), pp. 455-474.<sup>45</sup>

### 45.試述法國年鑑學派的理論特色與代表人物。

年鑑學派是一個史學流派，來自法國學術刊《年鑑》(*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這份刊物在 1946 年改名《年鑑·經濟·社會·文明》(*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1999 年又改為《年鑑·歷史·科學·社會》(*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年鑑學派以採取社會科學的歷史觀著稱。年鑑學派提倡「整體的歷史」，注重歷史的長時段發展，且跨學科的研究，將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納入歷史學中的概念，為歷史研究開了一扇窗，從此歷史學家的研究範疇由政治史轉移到社會史、文化史。

年鑑學派為 1929 年由當時任教於斯特拉斯堡大學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的馬克·布洛赫 (Marc Bloch) 與費夫爾 (Lucien Febvre) 創始。他們結合了地理學、歷史學與社會學。他們依循社會科學的歷史觀，但又不像大多同時期的史家

---

<sup>45</sup> 參考自新史學雜誌撰稿格式：<http://saturn.ihp.sinica.edu.tw/~huangkc/nhist/nhl.doc>。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般過度強調。這樣的態度使得年鑑學派較強調一段長時期的歷史架構，看重地理、物質等因素對歷史的影響，也衍伸出心態史的研究。此種態度最著名的研究成果即為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此學派最出名的學者——之《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

年鑑學派的繼承學者，如具有代表性的埃瑪紐埃爾·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與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轉而強調以文化史、經濟史的觀點研究歷史。<sup>46</sup>

### 46.何謂史料的外部考證與內部考證，試論述之？

史料的外部考證是辨析史料的來源，即是考證、推敲史料被造成的時間、地點及其人際關係。近年完成的史料，從書籍、文書到器物也都明白標示時間而無須考證。外部考證主攻的各類問題包含偽造、竄改文獻、殘缺版本、剽竊、捉刀、歪曲及處理史料中有意無意的錯誤。外部考證尤其是指確定史料的權威性和年代、日期，以利於證實或證偽證據的真實性。

而史料內部考證的目的在於確定證據的可信性，內部考證牽涉到對事件、概念或習慣的陳述。從事比較性研究，亦即與時日已經明確的其他史料作外型特徵，即從其式樣、材料、技術等作比較。決定考古學的遺物問題多適用此一方法。文獻史料方面，文獻史料方面，其用詞與型式等，可作為標準，即使是文言文也具有書寫年代的要素。如係紀錄，則從其內容探求線索，從而加以判斷。但要能精確判斷其時間關係是很困難的，僅推論其時間的先後次序即可。

<sup>46</sup> 參考轉引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4%E9%91%91%E5%AD%B8%E6%B4%BE>。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 47. 試論述何謂歷史的比較研究法與「比較史學」？

史料的比較，是歷史比較研究的初步。進一步具有積極性與活潑性的比較是將歷史上所發生的種種現象，放在一起做比較。而歷史的價值也能透過比較研究將它真正的表現出來。<sup>47</sup>

比較史學是從事歷史比較研究的史學。歷史比較研究，就是通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歷史現象的比較來加深、擴大和驗證對歷史的認識的一種方法。近代歷史學家將不同程度的歷史上各個不同的民族加以縱向和橫向的對比，通過對比來說明他們龐大的思想體系。孔德把比較研究作為探求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一個主要方法，這成為歷史比較方法的最早的理論探索。另外英國史家湯恩比在其著作《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裡面，將三十多種不同的文化做比較研究，雖然所得的結論不令人滿意，但這是具有開創性的研究。從 20 世紀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比較研究成為歷史研究的新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歷史比較研究的範圍從歐洲擴大到全世界，更多借用其他學科的概念和方法。

隨著比較史學的發展，歷史學者對比較史學進行方法論上的探討。這些探討主要涉及了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比較史學的分類問題。第一類是用歷史實例的對比來證明某一理論的觀點；第二類是通過歷史比較來發現某一具體事實的特性和影響；第三類是通過歷史比較進行宏觀的因果分析。第二，歷史比較研究有三個優點，一是導致提出有用的問題；二是從反面檢驗已被接受的歷史解釋；三是推導出新的歷史結論。

48. 清末民初時期，中國經歷數千年未經之巨變，西方的各項學說大量湧入對於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造成莫大的衝擊，進而有學者對於傳統史學進行強烈的

<sup>47</sup> 可參照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增訂新版）》（台北：三民書局，2005年），頁109。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批判，並且力倡促成了近代中國的「史學革命」。試舉當時的知識份子一人為例，並闡述其思想內容？

以近代學者梁啟超為例，梁啟超先生在其著作《新史學》中，提出了史學革命的主張，宣導中國必須跳脫出傳統史學的束縛。他在《新史學》一書中開頭就指出：

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sup>48</sup>

他說史學是最重要的功能是作為國民的歷史借鏡，激發起人民的愛國之心，已達到教育國民的作用。他認為現今西方之所以能船堅炮利，日趨文明，並非毫無原因，是因為他們的史學教育達到教育大眾的作用，形成強大的民族主義凝聚力，國家才會富強。梁啟超先生在指出先前此章開頭所提的中國傳統史學四大弊病的同時，卻又一針見血指出舊史學還存在者兩大弊端以及隨之而來所產生的三大惡果。所謂兩大弊端，即是：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他認為中國傳統史書通常「述而不作」，大部分的史家只知蕭規曹隨，不知變通；知作政治史，而不作其它歷史，因而史學思想就只囚錮在一個框架中，沒有新的發展與突破，以致於形成現代落後於西方的窘境。而隨之而來產生的所謂三大惡果分別為：難讀、難別擇、無感觸。

梁啟超先生認為預先創造出新史學，不可不先明史學之界說，他將進化論的觀點引入了歷史研究領域，為當時的史學界注入了生動和活力。在《新史學》中認為歷史的目的乃是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對歷史學與進化的關係給予明確的闡述，他指出只有弄清歷史學與進化論的關係，才可以知道歷史的真相，並且進一步強調進化論對史學的指導作用。他認為做歷史者必須要進一步闡述人群進化之

<sup>48</sup>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正補編·新史學 合刊）》（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9 年五刷），頁 3。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理，並且要有理想，這樣寫出的歷史，才能算是良史。

因此梁啟超先生批評了傳統史學的弊端和不足，提倡近代的史學觀念和方法，寫了歷史研究方法和學術文化史方面的著作。另一方面，他所呼籲的「史學革命」對國內的知識份子有一定程度上的啟蒙作用，促進中國傳統史學的近代化。因此，他在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轉變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49. 請解釋何謂「直接史料」、「間接史料」、「有意史料」、「無意史料」？其價值為何？

直接史料又稱為第一手史料，係指事件發生時，實際的觀察者或參與者所提供的報告或留下來的各項筆記和紀錄，其包括下列幾種：1.當事人直接的觀察與回憶。2.同時期的人的記載。3.一切與事實有直接關係的史料。4.直接史料必須試第一手的史料或者說是原來的史料，而不是二手或轉手的史料。

間接史料又稱做二手資料，係指由非直接參與或觀察到事件的人所做的報導，或留下來的文件記錄。簡單來說凡非直接的史料、非原形的史料、是經過轉手的史料，都是間接史料。因此凡由口頭傳說而轉為記載的史料（同時人的記載除外）、後人編纂的史書與仿製品與改造品，都屬於是間接史料，因此間接史料的價值在直接史料之下，不言可喻。

有意史料為史料作者蓄意存留某一部分往事，大凡名流的回憶錄、公家的宣傳冊子以及肆意頌揚或詆毀的一類文字紀錄，就稱為有意史料。相對於有意史料而言，無意史料則為不知不覺中的表現，沒有預定的目的、周密的計畫，只是自然的流露出來。如報紙中的廣告是無意史料（新聞為有意史料），俗語、遺風遺俗以及法院的公告判決書等，都可稱為無意史料。有意史料的價值，遠在於無意史料之下。而歷史的真相最需要無意史料來表白。因此像是杜維運先生就認為，

## 102-1 宗教史學--「史學導論」

史學家進一步以敏銳的眼光、縝密的心思積極去發現無意史料是真歷史的保障。

### 50. 試述史學著作中紀傳體與編年體兩種體例各有何優缺點？

紀傳體是司馬遷寫《史記》的體裁，以「人物」為主，敘述某個特定人物身邊所發生的事情，而史記中敘述的人物會重覆，所以對某件事情來說，從一個人的角度看跟另外一個人的看法會不一樣，主要是看描述的人是誰。而史記總共有五種體例：本紀（序帝王），世家（紀諸侯國），表（繫時事），書（詳制度），列傳（誌人物）。此後的史書都以便以這種體例來記載史事，又稱正史。它最重要特點是突出了人在歷史上的地位；以大量的人物傳紀為中心內容，把記言和記事進一步結合起來。歷史不單是一宗宗的事件，人物才是最具舉足輕重的元素；歷史不單是王侯將相的歷史，縱使俳優與游俠，儒林商賈，卜者酷吏，皆得借列傳以垂名於後，不至湮沒無聞；歷史更包括邊疆民族和制度、文化等等。

編年體顧名思義就是以年（時間）為單位，詳細記載每一年發生的大事，雖然可以很清楚一整年發生了那些事情，但是內容繁瑣。這種體例的起源最早（春秋、左傳便是以編年體所寫），隋志稱為「古史」，這是跟紀傳體比較起來不一樣的地方。編年體傳世的史書數量很少，所以一般都只看紀傳體較多，代表著作為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為代表。其優點在於清楚且具有條理的讓人明白歷史事件的發展次序與因果關係，但缺點為對歷史人物的生平和歷史事件的描敘不詳細，主要是同一事件發生和延續的時間過長，記載時就難免犯前後割裂的毛病。還有記人物活動時，更難詳其來龍去脈，就此方面來看較紀傳體顯得瑣碎許多。